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五千年一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15）上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 200 件大事

东北“易帜”

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所向披靡，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是岌岌可危。此时。张作霖审时度势，决定把自己的军队撤到关外。当他的专车行至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药炸中，张作霖身负重伤，不治而死。少帅张学良临危受命，担任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以国家大局、民族利益为重，坚信“南北统一，人心所向”，冲破了重重阻力，毅然决然地在东北挂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不久，又闪电般地处决了杨宇霆、常荫槐，巩固了他在东北的地位。东北“易帜”，结束了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控制东北、分裂中国的企图，其意义和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地区觊觎已久。早在甲午战争之后，它就强迫清政府将辽东半岛地区割让，只是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阴谋才未能得逞。

1904年2月8日，日本袭击俄国在中国的“租借地”旅顺口，日俄战争爆发。最后，以俄国失败而告终，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同意将长春以南的所谓南满地区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日本。这样，日本帝国主义的胃口终于得到了部分的满足。

东北地区美丽富饶。它的面积占全国领土总面积的 1/10 还强，达 130 万平方公里；它矿藏极为丰富，煤、铁、石油、黄金的储量均很高；它农业生产发达，农产品丰富，大豆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60%，小麦、稻子、小米、高粱、玉米等产量都很高，正常年份五谷产量可达2000多万吨。物产丰富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垂涎三尺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一直认为自己在满蒙有着特殊的权益，决不容许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染指。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叫嚣：“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日俄战争后，为了确保在满洲的利益，日本在东北地区相继成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三大机构，并且将这三大机构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三大支柱。1915年，在向袁世凯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第二款的七条内容全部是关于南满及蒙古地区问题的，这就是后来日本一再要求张作霖解决的所谓“满蒙悬案问题”。

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很快地打到了长江流域，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阀势力相继被灭。后来，由于革命军内部出现矛盾，北伐战争一度中止。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将部队整编为四个集团军，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集团军总司令，进行了“二次北伐”，矛头直指北京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

1928年，“二次北伐”开始以后，北伐军沿津浦路向前推进。行至济南时，日本军队出兵阻挠，枪杀了中国军民4000余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为此，北伐军一度停止了前进。利用这个机会，张作霖一方面发表了“息争议和”的通电，说什么“凡属讨赤者，虽敌为友”，呼吁“停战议和”；另一方面派出代表去南京游说，希望准许他“同参政事”，一致对外。这个请求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要员和地方实力派的同意，并已拟成提案，准备交国会讨论通过，但是由于发生了意外而失败。

张作霖“同参政事”的请求在他的历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如能顺利通过，时局将会是另一番面貌。对此，负有重大责任的新闻记者张友鸾也认为：“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那个提案如果顺利通过，后来事态的发展，定会造成另外一种局面，追悔莫及。”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张友鸾当时是南京《民生报》的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同时还兼任北京《世界日报》、汉口《中山日报》、安庆《民国日报》的驻南京记者。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主要由谭延恺、李烈钧、蔡元培主持。蔡元培不常到国府去，谭延恺只管大事，所以日常事务都由李烈钧负责。当时的国府每星期一都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李烈钧每周一都按时出席，和记者们的关系搞得很好。

一天，张友鸾去国民政府采访，刚好碰到李烈钧外出。李烈钧透露出他那里有“好新闻”，但还需保密。记者的职业特点使张友鸾穷追不舍，最后终于使李烈钧透露出当晚要召开国府会议通过张作霖“同参政事”的提案，并交给张友鸾一张油印好的“请准许张作霖同参政事案”。提案内容大意是说“北伐军事，虽然胜利在望，总还要付出相当代价。如今张作霖表示悔过，请求言和，似可予以接纳，准其同参政事，早日结束战争，进行建国大业”。内容后面是提案人的签名，有国府委员中的要员，还有四个集团军的代表。当时，张友鸾认为阎锡山和张作霖是生死冤家，是不会同意这个提案的，所以就去找阎的代表刘朴忱，遗憾的是刘不在，另一位代表赵丕廉接待了他。赵相当于“特使”，在阎锡山的面前地位比刘朴忱高。阎锡山本不同意张作霖“同参政事”，但因为其他人都同意了，想反对也反对不了，所以就送了个人情。谁知刘朴忱为了独占功劳竟瞒着赵丕廉签字。赵非常生气，就把不常问事的蔡元培请了出来。蔡元培德高望重，为人耿直，连谭延恺、李烈钧都惧怕三分。当晚讨论提案时，蔡元培果然来了，他一瓢冷水一泼，结果这个提案也就没有被通过。

张作霖的“同参政事”没有被国民政府通过，固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但是，假如此案当时能获得通过，那么，其历史意义肯定会是十分深远的。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当时，张作霖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一方面，前线连连败北，直鲁联军不支溃退，北伐军逼近北京、天津地区，安国军政府危在旦夕；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趁火打劫，不断地会晤张作霖，向他提出许多无理要求。

张作霖在成为“东北王”的过程中，是得到了日本的大力帮助和扶持的，特别是 1925 年郭松龄反奉时，张作霖一败涂地，非常狼狈，他都作好了逃跑的准备，如果不是日本人的帮助，张作霖非垮台不可。但是，张作霖是深知日本人的狼子野心的。他和日本人的关系是十分微妙和复杂的，他们之间既相互依靠又矛盾重重。张作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日本人在东北的扩张，在他确立权力的过程中，张作霖逐渐地由依靠日本人而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1928 年，北伐军逼近北京时，日本加紧了对张作霖的威逼利诱。5 月，田中义一首相派山本条方郎为代表潜至北京，逼迫张作霖签订所谓满蒙新五路的“承造合同”，即要求张作霖把已签“阅”字的《满蒙新五路协约》变成立即生效的铁路承造合同。该“协约”规定，中国委托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承办建造五条铁路，待竣工移交后即须向满铁支付建造款，如果到时没有能力支付，那么就必须立即转为借款，年息 8 厘。张作霖先被逼签阅了“协约”，

无奈又在承造合同上签了字。其实，这是张作霖惯用的软磨硬泡的办法。所谓“阅”字，其意义是含糊不清的，只表明知道了这回事，却包含有同意与不同意两种截然相反的意思。所以，就连田中义一首相也怀疑张作霖“究竟有无诚意”，认为“倘若无诚意，尽管满铁社长带回签有‘阅’字的协约，亦系无充分诚意之文件，虽强使张作霖在正式文件上签字，包括缔结承造合同，恐张亦必将制造某种理由拒绝实行。征诸往例，事属必然”。

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使得日本帝国主义担心“战乱波及满洲”，影响到自己的利益。于是，日本一方面胁迫张作霖回到关外，另一方面，则大量增兵青岛，并在5月18日向张作霖和蒋介石发出警告，声言：“维持满洲的治安，乃为帝国所最重视者，因此将形成扰乱该地方治安之原因的事态发生，帝国政府将极力予以阻止，所以战乱如果进展到京津一带，其祸乱将波及满洲的时候，为维持满洲的治安，帝国政府或将不得不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来防止一切不利局面的出现。”

在日本“五一八警告”发出的头天晚上，日本驻华大使芳泽谦吉来访。当时，张作霖和梁士诒、李宣威等人正在打麻将。见芳泽来后，梁、李等人提出要走，张作霖说：“我与芳泽没什么可谈的，不大工夫就能说完。”谁知一谈竟然谈了4个多小时，但仍然是毫无结果。芳泽先是逼迫张作霖签订中日合资修筑铁路合同，并说如能答应那么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向北推进。张作霖正言厉色道，“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芳泽威胁说：“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张作霖马上回击：“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见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掏出了预定次日发表的“五一八警告书”给张作霖，同时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说没有接到报告，没想到芳泽竟威吓说：“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张作霖一听，勃然大怒，从座位上猛然站起，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向地上猛然一摔，折成二段，声色俱厉地喝道：“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个巴子的，岂有此理！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说完后，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

在此之后，奉军的处境便越来越艰难了。杨宇霆、张学良等都力主“老将回奉”。张作霖审时度势，知道奉军在关内大势已去，继续呆在北京，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于是，在5月30日，张作霖向全体奉军下达了总退却令。所有的奉军集结在京津一带，随时准备撤往关外。就在张作霖即将离京前往东北的前夕，芳泽谦吉又来到了张作霖的驻地——北京中南海。这一次，他是来逼迫张作霖履行“日张密约”的。

所谓“日张密约”，是1925年郭松龄反奉时作为日本对张作霖的支持条件而签订的，内容是同意日本在东北地区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等。事后，张作霖深知此事关系重大，所以又秘密指使省议会反对这个“密约”，他就以此为借口同日本拖延、主张“等待风头过去再谈”。张作霖离京前夕，芳泽再度对他进行威逼。张作霖真是怒火中烧，但表面上却推脱说太忙了，叫把文件先留下，待签完字后再通知来取。6月3日下午，芳泽又一次来到了中南海威逼索取。张作霖让人把芳泽让进客厅，然后，就故意在办公厅里高声骂道：“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

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很显然，他这是骂给芳泽听的。骂完了以后，他叫外交人员将文件转给芳泽，并转告说：“大元帅太忙了，不能会见了，还望原谅。”芳泽回到公馆后，急忙打开文件，见张作霖在上面只写了个“阅”字，才知道又一次地上了当，于是马上打电话到大元帅府询问，但此时张作霖已踏上了归途。当时的日本政府对张作霖是非常矛盾的。此前田中义一首相和张作霖的日人顾问町野武马曾有过一段生动的对话：

田中：“内外的情势，教我们在此时此刻非一下子把满洲问题解决不可。……甚至以武力来解决亦在所不惜。你认为如何？”

町野：“……我们假设在银座（日本东京最繁华、最热闹的街道）街头，要强奸一个美女，要强奸她，我想是办得到的，但是，事后那些大哥来找你麻烦，你说应该怎么办？”

田中：“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很显然，这里的“美女”是指的中国，而“大哥”则是指英、美等国。

正是鉴于种种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田中义一认为施用武力不如不用武力达到目的，于是就采取了保留张作霖的方针。日本人草柳大藏所著的《满铁调查部内幕》对此作了诗情画意般的描述：

“据说，曾是一个月明之夜，田中和二位使者一同漫步在银波冲洗过的沙滩上，下达了他的决定：

‘停止一切行动！’”

这里的“行动”，是指日本关东军为行施武力而于5月18日秘密发出的总动员令，包括集中兵力、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移到奉天，向锦州、义县、山海关、朝阳一带派兵警戒等等；“二位使者”是关东军派往东京呈请首相批准行动计划的。

然而，关东军却是被一群狂热的好战分子所把持。荒木贞夫大将听到田中首相的决定后大叫：“这么一来，后果实难设想！”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少将在6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按一己之见，推行政治的当今首相，应予撤换。噫！”6月3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软弱外交是不能成事的。”

这些好战分子认为张作霖是日本把东北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最大障碍，是满蒙政策的最大眼中钉肉中刺，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想除掉张作霖。他们认为，“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只要一个张作霖垮台，其他的所谓奉系将领必然树倒猢狲散，一定要杀头目，看透了，除此以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

为了对张作霖实施所谓“外科手术”，关东军司令村冈命令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睛少佐到北京，打算借华北驻屯军之手“干掉”张作霖。竹下受命退出“司令官室”后，在二楼走廊上遇见了河本大作。竹下说话时神情有点“紧张”，河本立即断定有重要事情，于是热情地邀请竹下去吃饭。就在沈阳十间房招待所的“绿”字号客间里，杀掉张作霖的计划出笼了。

原来，河本也在秘密策划谋杀张作霖。当他得知竹下少佐受命杀张以后，欣喜若狂。他指出在北京耳目众多，不易行事，万一失败了不好交待。接着，自告奋勇地说：“让我干吧！别无他图。”要竹下到北京只要把张作霖的准确行踪告知河本就行了。当竹下表示那是他亲自受命于村冈司令官时，河本大作循循善诱道：“作为司令官，亲自参与那样的谋划不相当。……对你来说，不存在违反司令官阁下命令的问题。你奉命去北京好了。你放出的刺客在北京，还是在什么地方，司令官阁下并没有限定场所……”并保证他一人

足以能够完成任务了，愿意担负一切责任。这样，在竹下少佐的默认中，两个谋杀计划融为一体了……

经过严密的侦查，河本大作选定了爆破地点——皇姑屯附近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处。在这里，京奉铁路上面是一架铁桥，南满铁路横穿而过，日本人在桥上昼夜巡逻，中国人不允许靠近，选择这样的地点，既便于安放炸药，又不至于引起人们的怀疑。

地点选定以后，关东军就派出十几个工兵，将 120 公斤黄色炸药分装成 30 麻袋，装置在两路交叉点中间的一个花岗岩桥墩上：电爆装置则安置在桥墩 500 公尺外的了望台上。诸事准备妥当，就静候张作霖的出现了。

6 月 4 日，凌晨 5 时 23 分，当张作霖的专列行至皇姑屯时，关东军东宫铁木大尉一按电钮，随着一声巨响，一股黑烟腾空而起，高达 200 公尺。张作霖所乘的第八节车厢炸得粉碎。张作霖当场昏倒在血泊之中。

张作霖被运回沈阳大帅府后，对夫人说：“ 我受伤太重了，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说罢不久即去世，时间距被炸后仅 4 小时零 7 分。

张作霖被炸的当日，张学良在北京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举行了会晤；杨宇霆也参加了此次会谈。当时，国民政府就提出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条件。即：东北地区必须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奉军中的孙传芳部和直鲁联军必须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东三省必须服从国民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谈判不可能取得成功，但却交换了意见，确立了国民政府对于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

6 月 4 日，是张学良的诞辰日。中午，张作霖被炸的消息就传到了张学良所在第三、四方面军团联合军团司令部。但是，祝寿的宴会晚间仍然照常在怀仁堂进行。因为得到了张作霖被炸的消息，所以大多数人都很恐慌，祝寿的气氛并不十分热烈。但张学良却镇定自若，谈笑风生，若无其事。

张作霖被炸，正应了古人所谓“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之阴谋，其真实意图并不是为了杀张作霖这个人，而是借张作霖被炸引起的人心慌慌和社会混乱之机混水摸鱼，大规模地挑起武装冲突，并进而吞并整个东北。

果然，炸车以后，日本军人和侨民不断地寻衅挑斗，企图引起事端。他们到处制造爆炸事件，仅 6 月 10 号晚间，就在东北地区数十处投掷炸弹。他们还出动了 18000 人的军队在沈阳城南的浑河沿岸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并高唱“ 南满是我的家乡 ”来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气焰真可谓嚣张之极。

日本的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的。因此，奉天当局一方面对张作霖的去世秘而不发，而且每天按时开饭，医生按时出诊、换药、记病历，甚至找了一位和张作霖相象的“ 替身 ”，每天下午都穿着“ 病号衣 ”按时在花园里散步；另一方面，派人去北京密报张学良火速返奉。这是日军没敢冒然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否则，正如河本大作所说的“ 如果当时在那里紧急集合，满洲事变也就在那时发生了。 ”这句话，是日本当时驻北京的武官田中隆吉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的。

张学良回到奉天后，面对着丛丛荆棘，立即开始挥舞起了他手中的利剑。他公布了张作霖于 6 月 21 日逝世的消息，通知了各国驻奉天的领事馆，正式成立了丧礼处。同时，张学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举一动都保持了严密的注视和高度的警惕。密令东三省的奉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应付紧急情况的出现。

“猫哭老鼠”是阴谋家们惯用的政治手腕。在宣布为张作霖治丧以后，日本政府特派前驻中国公使“中国通”林权助为专使来奉吊祭。日本政府给林权助的训令是：“万一敌军侵入东三省，则日本决尽其牺牲以执行其现实之政策，维持东三省之和平与秩序。”在8月3日举行的吊唁典礼上，田中首相所送的花圈与写有“雨公千古”的蒋介石所送的花圈并排地放在显眼的位置上。

8月9日，张作霖的葬礼完毕以后，张学良由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陪同，前往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答谢。宴会后，双方的交锋便立即开始了：

林权助开门见山，一开始就提出了此行的主要目的：“我是承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之命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日本政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在日本人心目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它的命运，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地关心。如今专以排斥外国势力为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经席卷华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到满蒙。并且我们听说，张将军有随时换上青天白日旗的打算。我们对此特别关切，请张将军将你的意见告诉我们。”

对此，张学良略加思索，巧妙得体地回答：“林权助阁下，你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东北地方当局，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两国缔结的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尊重的。至于说到国民革命军，我虽然和他们交过手，打过仗，但是我很佩服他们。现在我和他们还没有来往，至于何时我和他们有来往，我还不能断定。好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也可以说是友邦，对我们中国人自己家里的事情恐怕不会太感兴趣吧！”

对于张学良的回答，日本人气急败坏，立即露出了强盗蛮横的嘴脸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领事林久治郎恶狠狠地说：

“帝国政府对东三省向南方妥协，表示坚决反对。甘冒干涉内政之嫌，亦在所不惜。请阁下三思！”

张学良听后，正言道：“我的决心是看东三省人民的想法如何而定，违背东三省人民意向的事，我不能做！”

到后来，林久治郎竟然指手划脚，以命令的口吻说：“我们日本就是不准你们东北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张学良勃然变色，怒声喝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此时，林权助出来打圆场说：“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我们日本的特殊权益，也是为张将军您自已着想。听说国民政府这帮人都有外国背景，手腕非常毒狠，和他们打交道，找不出什么好处来。况且，张将军在东北是唯我独尊，和他们合流后，你还能有比现在更好的地位吗？当然，你不必害怕他们，只要你肯同我们合作，我们便会绝对支持你。”

说着说着，林权助就露出了“狐狸的尾巴”，以教训的口气说：“你的父亲曾是我的挚友。因此，我对你有亲如爱子的感情。愿向你进一言：‘你的想法十分危险！’”

十足的侮辱人格！张学良愤然而起，高声还击：“我和贵国的天皇是同岁，我想要对阁下说的，只此而已。”

这次会谈共4个多小时。回来后，张学良立即召开了东三省保安委员会会议，传达了谈判的经过，商讨了对策。

事后，他对白崇禧的代表何千里说：“这不是人受的，我，他妈的成了

鸟司令了。”他对王家桢说：“日本人太欺侮我们了！”并告诉门启官没有王家桢的批准，不准日本人见张学良！这次交锋之后，日本帝国主义霸道野蛮的嘴脸暴露无遗，张学良更加认清了日本的嘴脸，同时，更加坚定了服从国民政府的决心。

日本的野心没能得到满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在这次交锋不久，林久治郎回国述职，临行前又施展了引诱、骗人的伎俩。他对张学良说：“我们日满关系这样的密切，可是现在还有些人为的障碍阻挠我们的亲善关系，那就是：一方面是不合理的治外法权损害中国的主权；另一方面是中国政府不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有居住权。日本政府为率先表示对张将军的好意，愿意比各国提前放弃在满洲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只要张将军也允许日本人在满洲内地有居住权的话。”

对此，张学良未加思索地就答应了。其实，这是日本的又一骗局，日本当时在东北内地和非商埠地并无商租权，不可能租到房子。张作霖在去世前的 13 年间共发了 40 多号训令，严禁日本人租用中国土地经商和中国人出租土地给外国人。所以在东北地区根本不存在治外法权问题。而张学良答应了日本的内地居住权，这正是日本多次要求张作霖未成而梦寐以求的。张学良明白了日本的圈套后非常着急。王家桢建议张学良写一封亲笔信给林久治郎，就说由于这次谈话很重要，担心翻译有差错，所以将谈话内容再扼要地复述一遍，免生误会，此场风波才算平息。

在东北问题上，日本人真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然而，它却没有如愿以偿。

蒋介石“二次北伐”开始时，在津浦线上遇到的主要敌人是张宗昌、诸玉璞的直鲁联军。

直鲁联军是 1928 年初形成的。当时张宗昌任山东督军，李景林任直隶督军（后来褚玉璞接任了李景林）。为了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张宗昌和李景林结成了直鲁联军。

张宗昌是山东人，矿工出身，后与土匪为伍。他有个外号叫“狗肉将军”；又有人称他为“长腿将军”，因为他个子大，腿长。山东人民中流传着二句民谣：“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他是出了名的“三无数”，即兵无数，他不知手下有多少兵，一时心血来潮，就随便封人为旅长、师长，有没有兵他不管；钱无数，他滥发军用票，强迫人民接收，高兴时，给别人钱一下就是几十万；女人无数，有多少姨太太他不知道，姨太太跑了他也从不追问，而且还可以随便和副官调情打闹。当然，这难免是夸张之词，但由此亦可对他的品性窥见一斑。

褚玉璞原来也为土匪，追随张宗昌多年。二人互相利用，形影不离，狼狈为奸。

张、褚二人从津浦线上败退下来以后，暂时驻扎在唐山一带。这时，张宗昌声言要率 10 万大军开出关外整训。他向张学良提出要开到辽东半岛一带整训，并将此地划为他的永久驻防区。其实，张宗昌是另有所图，他是企图依靠日本的力量而图谋不轨。

对张宗昌的企图，张学良非常清楚。张学良当机立断，同国民革命军白崇禧部南北夹击，消灭了直鲁联军，进一步取得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信任。

直鲁联军被消灭后，张学良纯化了东北军内部，减轻了内部的压力，对早日实现易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张作霖和奉军撤往关外后，蒋介石和平接收了京、津地区。接着，在 6 月 20 日，新疆督办杨增新宣布服从国民政府。这样，除了东北地区外，整个关内都飘扬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来。

当时，蒋、冯、阎、李的四个集团军共有 67 个军又 9 个师，号称 100 万，而东北军只有 40 万人。但是，一方面由于蒋介石的内部并不统一，各人有各人的算盘；另一方面又担心日本干涉，所以，蒋介石极力主张免用武力，和平统一。蒋介石很清楚，他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矛盾重重，他们之间的战争迟早要爆发。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同时更是为了取得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的支持，他竭力取得张学良的“好感”。同时他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决不会坐视他挥师出关，担心“济南惨案”重演。在当时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东三省为我国重要国防疆地，乃日本势力侵入久矣，吾措置办法，非慎重周详不可，否则，东西战略之导火线一旦爆发，不可收拾矣！”

张学良回到沈阳的第二天，即发布公告，宣布了张作霖的所谓“遗命”：“本上将军现在病中，所有督办奉天军务一职不能兼顾，着派张学良代理。”

张学良就任奉天军务督办之后，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召开。会上，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张作相被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相封建正统思想极为浓厚，且讲究义气，视张学良为“先帝遗子”，因此坚辞不就，并竭力推荐“老把侄”张学良担任总司令。于是，省议会联合会才改推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

7 月 4 日，张学良发表通电，正式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在通电中，他“敬以至诚之意”，向全国“父老”“倾吐素抱”，表示“国家大事，民意所归，即国是所在。自今以后，以全体民意为准则，循序渐进，其一切制度规章，悉采取众意，归于公决。……志愿所在，生死以之。”

在发表通电正式就职之前，张学良曾经发出一个和平通电，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一切军事对抗；蒋介石立即作出反映，在北京向日本东方社记者发表了谈话，声明要用和平的办法解决东北问题。

为了表达诚意，加快“易帜”的进程，张学良派出了邢士廉、王树翰、米春霖、徐祖诒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进关与国民政府磋商有关“易帜”的具体事宜。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接见了他们。双方均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东北提出的条件有：东北政治委员会主任由张学良担任；国民革命军不得进入关外；南京政府不得干涉东北的军政；南京不得在东北设立宣传分支机构；热河省划归东北管辖。南京政府的条件则是：奉军必须出关；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服从三民主义；东北政治分会主委由国民政府派人担任；东三省划归第六军区，军区长官由国民政府派任。然而，蒋介石私下又表示，只要东北“易帜”和实行三民主义，其他一切问题均好商量。接着，南京政府又派出代表刘光、张同礼等人到沈阳，商讨东北的易帜问题。双方的接触越来越频繁。

当东北地区的“易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在一旁密切注视的日本也在紧张地寻求对策。内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东北的局势，确立了只要张学良承认日本与张作霖所订的条约，日本政府就承认张学良在东北的地位的方针。然而，日本的如意算盘又一次地打错了。张学良巧妙地与日本周旋，答复他们：“东三省政治，一依民意而定。东三省父老子弟如主改制，则彼

个人殊无权可以违抗。”

经过半年多的曲折经历，1928 年 12 月 29 日 7 时，在奉天省府礼堂，东北正式举行了“易帜”典礼。国民党政府派方本仁为代表监誓，各国驻奉天的领事除日本外均参加了典礼。张学良发表了演讲，指出：“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指日本）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纵，妨碍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举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

典礼后，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人领衔发出通电，向全世界宣布：“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此后，东北大地到处飘起了几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中华民国至此宇廓一清，正式统一。12 月 21 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

张学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明察时势，善辨是非，正如他所说的“南北统一，人心所向”，冲破了重重阻力，毅然决然地“贯彻和平”、“改旗易帜”，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着实可敬可贺，值得大书特书！

东北“易帜”后不到二周，即在 1929 年的 1 月 10 日，张学良在大帅府老虎厅处死了杨宇霆、常荫槐，这就是名噪一时的“杨常事件”。

杨宇霆是清朝的末科秀才，后被选送派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他聪明好学，比较有韬略，深得张作霖的赏识，先后曾担任 27 师参谋长，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奉军总参谋长，江苏省督办，安国军总参议，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团联合军团长等重要职务，成为张作霖的“左右手”。张作霖甚至将个人的私章都交给了杨宇霆。杨宇霆本人也自命不凡，以奉军的“诸葛亮”自居，并把原来的字“邻阁”改为“邻葛”。

常荫槐和张学良同岁。此人亦非常干练多才，敢做敢当，自负不凡。他曾担任“剿匪”司令部参谋长、军警执法处长、清乡督办、京奉铁路局长、交通部代部长、三、四方面军团政务处处长、交通司令、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黑龙江省主席、省长等职务。

张作霖被炸后，杨宇霆认为实现野心的机会到来了，大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感觉。的确，当时摆在张学良面前可与之伦比的人物只有二个：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张作相，再一个就是杨宇霆。

张学良和杨宇霆的矛盾由来已久。第三、四方面军团联合军团是奉军中势力最雄厚、装备最精良的部队，除拥有 50 万正规部队外，还管辖三四十个县和京奉、京汉、京绥三条铁路干线的交通，确实具有“登高一呼，地动山摇”之力。

军团中设二位军团长，一是张学良，一是杨宇霆。在军团的许多事情上，杨宇霆都同张学良发生矛盾和冲突。

张作霖死后，杨宇霆就以“辅弼幼主”的元老重臣自居，对张学良常常直呼其名，背后还称之为“阿斗”，并说什么：“他每天注射毒针甚多，将来必会自毙。”张学良当时吸食鸦片的恶习确实很重，开会时需要经常离席“过瘾”，这样，就由杨宇霆担任大会主席主持会议继续开会。当张学良有时下楼询问会议情况或提出什么主张建议时，杨宇霆总是粗暴地予以禁止，并当着众人的面说：“你不知道，你不用管。”

白崇禧派往奉天的代表何千里，在他的《桂系李、白对张学良的争取》一文中回忆了他亲自听到的张学良和杨宇霆的一次对话。当时。张学良抱怨

地对杨宇霆说：“我说我干不了，老杨，还是你来干的好！”杨宇霆轻松地笑着对张学良说：“唉！甭说那个，不要焦心，你现在身体不好，少烦神，多保养，有事大家商量，我代你张罗张罗。”言外之意，颇有一番力挽狂澜之意。

当时，日本人在奉天办的《满洲报》举办一个东北民意测验。报纸将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等数十人列成表，下面印有选票，要求读者进行测评。利用这一机会，杨四处收购该报，在选票中填上杨的名字，每日竟多达数千份。后来。因为杨府出卖数千斤废报纸，此事才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杨的这一作法，无异刺激了张学良的感情。

张学良和杨宇霆的矛盾激化，应该说是在杨为其父大张旗鼓地祝寿的那天。

那一天，杨府门前宾客如云，热闹异常，其规模和盛况在沈阳真是前所未有。张学良的亲信高纪毅、刘鸣九都参加了这次祝寿。高纪毅当时是警务处长。他回忆说当时“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以及广东、四川等地方实力派都派有代表来沈祝贺。日本政界要人亦派有代表前来。东北地方官吏更不消说了。庆寿那天，张学良前往祝寿，杨竟以普通礼节相待，与一般宾客无异。不仅杨之一举一动傲然以东北第一领袖自居，来自全国各地的贺客，对杨亦恭维备至，谀杨是东北众望所归的人物。张目睹这些情景，岂所能堪？当日观剧席上，张始终以手支颐，若有所思，其心情之苦闷，可想而知。”

刘鸣九当时是秘书处长。他回忆说，当时他们在杨府正喝茶聊天，突然听到杨的副官高喊：“督办来啦。”“杨入室后，围桌赌钱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肃然起立，直到杨与来客一一周旋后，人们才就坐。不久，杨的副官又在门外高喊：‘总司令到。’还是那些围桌赌钱的人，只有少数离座起立，多数是半起半坐，有的略一欠身。”

为了和杨宇霆联络感情，张学良曾命夫人于凤至同杨宇霆的三姨太太结拜为干姐妹。张学良亲自书写了于凤至的兰谱，还备了一份丰厚的礼物，谁知送到杨府后，竟然被退了回来，借口是行辈不同。很显然，这是杨宇霆以前辈自居，是对张学良的公然蔑视。

白崇禧曾经向蒋介石建议，用杨宇霆取代张学良。蒋介石把白崇禧的建议如实地告诉了张学良，并叫张学良先下手为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张学良的决心。

东北“易帜”那天，张学良和各界代表合影，杨宇霆却拒绝参加，挟起皮包愤愤离去，这一镜头，被当时的新闻记者拍下。这无疑是出张学良的丑，是对张学良的公然蔑视。

对于杨宇霆该如何处理，张学良是很伤了一番脑筋的。最初，他曾派秘书处长刘鸣九劝杨宇霆出国考察，遭到了杨的拒绝。在决定用武力解决以前，他还曾用一块银元作赌，先是许诺连掷三次如银元的袁头都在上面就开杀戒，结果三次全在上面；接着又许诺若连掷三次有字的全在上面就杀，结果一连三次袁头向下。

导致这场流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杨宇霆、常荫槐二人强逼张学良签字。

1929 年 1 月 10 日下午，杨、常二人一起来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任命常荫槐为督办。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便条，要张学良立刻签字。张被逼无奈，只好借口已到吃晚饭时间，待吃过饭后再作决定，并留二人吃饭。杨宇霆说已经告诉家人回去吃，表示吃完饭后再来，于是二人

一起离去。

杨、常走后，张学良立即打电话给警务处长高纪毅，命他火速来府。高到后，张学良向高下达了枪杀杨、常的命令，说：“杨宇霆、常荫槐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求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够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请示南京，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这简直太不成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并指示就在老虎厅内执行。

杨、常二人来到老虎厅时，一切已准备妥当。等他们坐定后，高纪毅就率领6名卫士冲进老虎厅，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二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人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面色惨白，惊慌木然，不知所措。卫兵冲上前去，不容二人说话，便开枪将二人击毙。

在除掉杨、常二人后，便彻底扫清了东北“易帜”的内部障碍，此后，东北同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日本人利用杨宇霆控制东北的企图。

东北“易帜”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它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由于近代中国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壮大的条件下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它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惨重失败。

5月1日、2日，报纸上披露了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北京大学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于5月2日，邀集一些学校的学生代表在西斋饭厅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办法。会上，一位学生当场破指写下了血书，代表们义愤填膺，立即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晚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邀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代表参加会议。

5月3日，本应是周末休息的时候，但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却是一片沸腾。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使学生们再也无法读书和娱乐，他们怀着一颗颗年轻赤诚的心，讨论如何拯救自己的祖国。第二天，即5月4日，数千名学生从古城北京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广场，勇敢地肩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掀起“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

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这就使中国人民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受到启示和教育：中国民主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有新的阶级力量来领导。

辛亥革命后的二三年间，中国民族工业出现了复苏的景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忙于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出现了一个很短的所谓“黄金时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逐渐成长和壮大。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只有65万人，到1919年“五四”前夕，就已经增加到200万人左右。

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工人罢工次数剧增，斗争规模扩大，罢工斗争的政治性也日益明显，开始由自发的、分散的斗争，发展到联合的、有组织的斗争。中国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显示了自己是反帝反封建最坚决的力量。它正逐步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变，并预示着它作为一支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随着新的经济、新的阶级力量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兴起了一场反对旧文化、旧思想的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失败后，一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识到，辛亥革命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发动武装革命前，没有唤起“多数国民的自觉”。所以，他们认为，要使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真正实现，必须以思想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启蒙思想运动，把广大国民从封建专制主义的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就在此时，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反动的复古逆流。为了回击这股反动逆流，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自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为标志。它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当时的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当时提倡的科学，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认识客观事物的科学观念。反对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还喊出了“文学革

命”的口号，要求以资产阶级新文学代替封建主义的旧文学，不仅在形式上且要在内容上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辛亥革命的继续，而它对封建主义旧文化、旧礼教的激烈批判猛烈进攻，又是辛亥革命所缺少的。这一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唤起了民众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并不懂马克思主义，当然更谈不上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工农群众的巨大力量，并加深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从 1918 年开始写了一系列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

革命的新曙光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升起。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是紧紧围绕着日本侵占中国山东及其权益问题发生的。运动的目标和基本要求，就是解决“山东问题”，即争回山东主权，争回被德国攫取的青岛、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等主权。

胶州湾位于黄海、渤海的要冲，地势十分重要，又是一个天然良港。德国对这个军事及通商要地觊觎已久，1897 年 11 月，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派军舰攻占了胶州湾。1898 年 3 月，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使整个山东省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青岛和胶州湾成为德国的租界。

1914 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先后卷入这场大战的有 33 个国家，战争双方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奥、匈、德组成的同盟国和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日本乘着德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对德宣战，派军队夺取了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各项权益。

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它不只要夺取山东，而且还想进一步独占全中国。1915 年它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向北京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此时袁正急于称帝，为了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表示完全承认日本要求，并命令外交总长陆宗舆在条约上签字。这样，陆和直接负责办理“二十一条”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成了中国人民最痛恨的卖国贼。日本下最后通牒的 5 月 7 日和袁答应日本无理要求的 5 月 9 日，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国耻纪念日。

1915 年 12 月，袁世凯称帝。但是不到半年，他就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讨伐声中死去。袁死后，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1917 年 8 月，段在日本授意下对德宣战，并向法国派出了 15 万名华工进行战地服务，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 年 11 月 11 日，打了 4 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匈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当协约国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当时广大人民之所以热烈庆祝协约国胜利，根本原因是他们认为能乘此机会争取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尤其是收回山东主权。大家普遍认为：德国武力霸占山东主权，是强权政治，协约国在大战中取胜是公理战胜强权；既然公理战胜了，且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因而理所当然应由中国收回山东主权。因而，“公理战胜强权”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中国人民怀着“公理战胜”的渴望，关注着巴黎召开的战后“和平会议”，并对这一会议寄予很大期望。

1919 年 1 月 18 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凡尔赛宫召开，参加和会的国家有 20 多个，实际上操纵着会议的是美、英、法三国。中国人民没有认识到一战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巴黎和会也只能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会议，因而广大国民对和会充满了幻想。

巴黎和会一开始，中国代表团就向和会提出了六项希望条件：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权。不久，在中国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又向和会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

中国代表的两项提案一提出，就被和会的最高会议——美、英、法、意四国首脑组成的“四人会议”挡了回来，理由是：这两项提案不在和会权限之内。于是，唯一的希望就是解决山东问题了。然而，英、法、意因和日本有密约而支持日本，美国为其自身利益，提出德国在中国的各项权益由和会暂收或交五国共管，将来有条件地交还中国，遭到日本代表的拒绝。这时，日本以退出和会和不参加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相威胁，最后，是在美国的妥协下，把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全部让给日本，满足了日本的侵略要求。

中国外交彻底失败了，中国人民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也随之彻底破灭，从而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早在 4 月下旬，当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时，全国人民就异常愤慨，尤其是广大山东人民，更是怒火中烧。4 月 20 日，山东人民 10 余万人在济南召开国民请愿大会。消息传出，鼓舞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斗志，推动了各地反帝爱国斗争的发展，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声。

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 5 月 1 日、2 日披露于报端。5 月 3 日，北京各界纷纷举行集会，讨论如何抗议山东问题的无理解决，下午，由政界人士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决定 5 月 7 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商讨办法。

可是，广大学生们已经不能等到 5 月 7 日了，就在外交协会开会的同时，北京的学生们已经在发起和筹备 5 月 4 日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了。

5 月 2 日，北大学生从校长蔡元培那里得到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当天下午，学生进步组织国民社在北大召开该社各校学生代表的紧急会议，一位叫夏秀峰的学生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决心，与会代表非常激动。会议决定 5 月 3 日 7 时在北大召开会体学生大会，并邀中等学校派人参加。

当晚，还未到约定的开会时间，北大法科礼堂内外，已经挤满了来开会的学生，除北大 1000 名同学全体参加外，出席的还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学生进步组织国民社、新潮社、工学社和平民教学讲团的成员，是这次大会的组织者和骨干。张国焘、夏秀峰等在会上发言，群情激昂，痛哭流涕。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巾，用鲜血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鼓掌声、呼喊声相继而起，全场一片义愤填膺的气氛。

大会在激烈的掌声中一致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通电各省于 5 月 7 日举行游行示威；定于 5 月 4 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为了筹备游行，学生们当场自动进行了热烈的捐助，银元、钞票、铜子、手表、戒指、毛巾、帽子等，都纷纷捐到台上来。大家的爱国热情达到了沸点。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 11 点了，但是，学生们仍然不去休息。他们有的负责联络其他学校，有的起草宣言、电报、传单，更多的人则是制作旗帜、

标语等，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床单扯下来，用来作游行示威的旗帜。

5 月 3 日夜，是一个不眠之夜，除了北大学生在积极准备外，北京高师工学会的一部分同学也在秘密集会。会议决定用激烈的手段惩罚卖国贼曹、章、陆，他们查明了三人的住址和门牌号，并从大栅栏的照相馆拿到了他们的照片，以便对证；有的人准备了火柴和小瓶火油，以便相机应用；以工学会的匡互生为首的各校激进分子 20 人左右作了牺牲的思想准备，有的人写好遗书，有的人向亲朋好友托付了后事。

一场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反帝爱国运动终于在北京爆发了。5 月 4 日，下午 1 点多，北京 13 所学校的 3000 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在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前，各校学生手中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水桥南边竖立的一幅大白旗，上面写着这样的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悖，余孽死有头”，落款是“北京学界同挽。”这里“曹瞒”指的是曹汝霖，“章悖”暗指章宗祥。北大学生谢绍敏 3 日晚写的血书“还我青岛”也悬挂在天安门前，人们群情激愤。

学生们在天安门汇合以后，召开了一个短暂的集会，然后，一名北大学生宣读了事先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接着，各校学生代表在会上演讲，揭露了曹、章、陆的卖国阴谋。学生们还散发了由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通告》的白话文传单 1 万多份。《通告》中提出了全国人民的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学生运动声势浩大，当时许多北京市民群众闻讯前来围观，并深受学生们爱国激情的感染，有不少人也加入到游行行列中来。

5 月 4 日，下午两点半，学生们开始游行示威，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天安门出发，学生们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当队伍走到东交民巷西口时，被守卫在那里的巡捕拦阻，学生们不得已之下，派罗家伦等人为代表将事先准备好的《陈词》递交美、英、法、意各使馆，表明中国人民收回山东主权的决心。被阻的 3000 名学生在烈日下整整晒了两个小时，他们痛切地感到：“国家还没有灭亡，自己的土地就不能自由通行，如果国家真的灭亡了，那将怎么能够忍受呢！”学生们怒火中烧，于是决定自己找卖国贼算帐。4 点半钟，学生队伍来到曹汝霖家门口。只见曹宅大门紧闭，门前警察林立，愤怒的学生高喊道：“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并将写着“打倒卖国贼”字样的小旗掷入院内。由于无法入内，大多数学生预备散队回校。在这种情况下，以匡互生为首的几个预备牺牲的同学奋不顾身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窗户打破，爬进曹宅。宅内几个全副武装的军警吓得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看着学生们把大门打开。

当学生们冲进曹宅时，曹和章宗祥迅速躲了起来。找不到曹汝霖，学生们愤怒异常，为惩办卖国贼，匡互生在曹的卧室点燃了床帐放起了火。藏在锅炉房里的章宗祥听说起火仓皇奔出，被愤怒的学生抓到，还误以为是曹汝霖将他痛打一顿；曹躲在一个小箱子里没被学生发现，才逃脱了学生们惩罚，但赵家楼已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火烧赵家楼是“五四”学生示威的高潮。曹宅起火半小时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批军警赶到，这时，绝大多数学生已散去，未及走脱的学生被反

动派逮捕。为了营救被捕的学生，5 月 5 日，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实行总罢课，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一致反对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倒行逆施。经社会各方面积极营救，被捕学生于 5 月 7 日被释放。

被捕学生释放以后，各校开始复课。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于 5 月 8 日下令“慰勉”请求辞职的曹汝霖，同时传讯 5 月 4 日被捕的学生。北大校长也在军阀政府威逼下辞职，离京出走。

于是，爱国学生同军阀政府的斗争重新尖锐起来，学生们强烈抗议军阀政府对学生们的传讯，并要求政府明令挽留蔡元培，为了争取全国学生的支援，扩大爱国斗争统一战线，北京学生联合会还派代表去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宣传联络。5 月 11 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也正式成立，和学生们一起参加爱国斗争。5 月 13 日，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共同向军阀政府提出警告，要求迅速答复学生们的爱国要求，否则，学生们将全体罢课，教职员将全体辞职，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也在这时纷纷向军阀政府提出辞呈。

在这种形势下，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5 月 14 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下达了慰留蔡元培的命令。然而，就在同一天内，北京政府也下了挽留曹、陆的命令，还连续下了两道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怒了广大青年学生,北京学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 5 月 19 日宣布总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不得签字和惩办国贼的要求。

根据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决定，5 月 19 日罢课以后，学生们广泛地展开宣传活动。学生演讲团以 7 人一组，纷纷涌上街头，向市民们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学生们讲到痛切处，听众们深受感动，有时甚至“痛哭淋漓。”许多市民主动给讲演的学生送茶送水，热情支持。同时，学生们还广泛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

“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因此，运动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百般地进行干涉和破坏。“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日本驻华公使即向北京政府不断提出警告，要求取消学生的排日运动。5 月 19 日总罢课后，日本侵略者的干涉变本加厉。对日本侵略者一向奴颜卑膝的皖系北京政府，顺从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对运动进行破坏。他们一方面对学生进行武力镇压，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分化手段，宣布提前放假，同时举行高等文官考试。在反动派的镇压和分化下，北京的学生运动一度转入低潮。一部分学生退出运动，广大学生仍坚持罢课。到 6 月初，由于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学生又掀起了新的斗争高潮。

6 月 1 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接连发两道命令：一是公然为三个卖国贼辩护，另一个是要求取缔学生的爱国运动，并要求学生们立即复课。

爱国有罪，卖国有功。这种对照使学生们十分气愤，他们决定从 6 月 3 日起，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如被逮捕，次日加倍出动，直至全部学生被捕完为止。

6 月 3 日，学生演讲团数百名学生上街演讲。军阀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驱散听讲的群众，并逮捕讲演学生 178 人，由于捕人过多，便把北大法科校所临时改为拘留所。充满爱国热情的学生并未被武力镇压所吓倒，6 月 4 日，更多学生上街演讲。这一天，反动军警又拘禁学生 700 多人，致使北大法科也收容不下。

连续两天的大逮捕，并没有使学生们屈服。6 月 5 日，参加街头演讲的学生增至 54 人，他们都背着行李，准备随时入狱。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推动了全国学生爱国运动的高涨，北京学生点燃的反帝爱国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各大城市。天津的学生首应而起，上海、济南、长沙、武汉、南京、成都等大城市和其他各地的学生，都纷纷罢课集会游行，就连在国外的留学生也展开了各种爱国活动，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军阀的爱国革命洪流。

广大学生的爱国运动，唤起了民众，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充分显示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先锋带头作用。但是，“六三”以前运动还只限于学生们之中，没有工人农民参加，因而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

北京政府的“六三”大逮捕，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怒，进而掀起了更大的革命风暴。五·四爱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运动中心也由北京转到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当“六三”大逮捕的消息传到上海时，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上海人民闻讯奋起，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北京被捕学生，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革命的烈火燃遍了黄浦滩。

和北京一样，上海的学生也走在运动的最前列，早在一个月前，当北京学生“五四”举行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上海时，上海的学生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以实际行动来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

由于上海社会力量比较雄厚、地位比较重要，所以，北京和许多地区学生的代表在“五四”运动爆发后，都先后来到这里，进一步推动了上海运动的发展。5 月 11 日，上海学生举行总罢课。

随着运动的发展，学生们认识到，在发动学生罢课的同时，应发动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群众运动的强大威力，完成救国大业，因而，上海学联决定总罢课时，就确定“联络商界为后盾”的方针。

然而，学生发动商界罢市，不是一帆风顺的。上海广大工商业者对日本侵略者极其痛恨，但他们考虑到营业利润和经济收入，对罢市一直顾虑重重，踌躇不决。正在这时，北京大逮捕的消息像一声惊雷，震动了上海各界人士，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愤怒，使“五四”爱国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

6 月 4 日下午，上海学生获知“六三”大逮捕消息后，纷纷走上街头。他们拿着载有天津学联电报的传单，不顾反动军警的镇压，到处宣传，并挨门挨户地动员各商号自 5 日起一律罢市。遇到不愿罢市的商号，学生们甚至“跪地泣求”。在学生们一再鼓动下，商界决定于 6 月 5 日宣布罢市。

上海总罢市得以实现，除学生的积极推动外，广大店员也起了重要作用，各地店员都积极配合学生敦促商人罢市。在罢市过程中，店员不断与资本家的动摇和妥协行为作斗争，使罢市得以坚持下去。例如，上海先施和永安两个当时最大的百货公司，罢市两天后资本家就发生动摇，店员们坚决进行抵制，表示宁可牺牲现在职业或被扣除薪水也不复市。有的店员破指血书“学生一日不放，本店一日不开”12 个大字贴于商店门前，以表示罢市的决心。在广大店员的影响下，中、小商人中也出现了不少爱国者。罢市所以能坚持下去，爱国的中、小商人也是出了力的。

上海是我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在商界宣布罢市的同时，上海工人为反对北京政府逮捕爱国学生，为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自觉地开始罢工。上海商人罢市，可以说主要是学生发动起来的，罢市所以能坚持到底，其根本原因是外有学生、内有店员的坚持和斗争。与此相反，工人阶级参加大罢工，完全是自动自愿的。上海工人罢工时，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到工厂去劝阻他们，工人回答说，“你们比我们受了一些教育，也比我们富足一些，你们没有想一想，我们工人难道没有良心，难道我们对卖国贼不能表示我们的愤怒吗？”“你们稍微想一下，难道爱国精神只限于你们这些人才能表现出来吗？”

6 月 5 日开始的上海工人政治大罢工到 6 月 10 日达到高潮。6 月 5 日，首先是日本纱厂的工人宣告罢工，接着，铁厂、印刷厂、电车公司、手工业和市政工人以至机器工人和海员工人都相继举行罢工。10 日，沪宁、沪杭、淞沪铁路工人全体罢工。

这次上海工人大罢工，为了统一的政治目标，打破了长期影响工人团结的地区和行业的界限，实现了各区行业之间的总同盟大罢工，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形成了空前强大的政治力量。

上海人民的爱国斗争，促成了全国范围内的革命高潮。从上海开始的三罢运动，不到一星期就迅速遍及全国 22 个省的 150 个城市。工人、学生以及商人的斗争汇合起来，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潮。“五四”爱国运动已成为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

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给了北京政府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工人罢工，使交通中断、生产停顿，对北京政府打击最大，而且各地继续酝酿着更大规模的罢工和罢市，使北京政府十分恐慌。在革命高潮的震动下，为了维护反动统治并安抚人心，北洋政府只好下令免去了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三个卖国贼被免职，是人民斗争的结果，是群众运动的伟大胜利。“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算是达到了一个。但是山东问题仍没有解决，因此斗争并没有结束。就在三贼被罢免不久，一场声势浩大的拒签和约运动，又紧接着开展起来。

由于和约直接牵涉到山东问题，因此山东人民在拒签和约运动中特别积极。为直接向北京政府表示山东各界人民反对在和约上签字的强烈要求，6 月 18 日，山东各界联合会决定派出请愿团进京请愿。然而，他们到了总统府门口，总统却拒绝接见，代表们受到卫兵、军警的种种阻挠。代表们极为愤慨，高呼：“山东之存亡，即吾辈之生死关头，今日如不得见总统要求以相当之保证，则誓死于此，亦不归寓。”他们在新华门前坚持不走，甚至“跪在门外，放声号哭。时适下雨，一小时后；各代表尽陷于水污泥潭之中，痛哭失声，闻者悱恻”。最后北京政府才被迫答应“接见”代表们。

6 月 23 日，山东代表推举 6 人面见大总统徐世昌，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山东的暴行，并提出山东人民拒绝签字、废除密约、严惩国贼三项要求。山东代表的请愿活动，使全国各地的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和约的运动。

当时，旅居法国的华工和留学生也积极了参加了拒签和约的斗争。6 月 28 日，是和约签字日期，留法华工和学生包围了中国代表团住所，迫使他们无法出席“和会”签字。在人民的巨大压力下，军阀政府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表示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次巴黎和约，是世界上几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制订的，中国代表竟然敢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空前的事件。至此，运动的又一个直接目标达到了，“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中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五四”运动是在世界革命尤其是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因而，它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具有新的历史意义和特征。

此外，“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还在于，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桥梁，马克思主义很快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此，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气势如虹，横跨在北京城西南郊外的永定河上，它不仅以它那悠久的历史、精美绝伦的石狮子而著称于世，它还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自治和独立的象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占领我东北三省和察哈尔省大部，而且还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夺取我大量主权，日本法西斯并不以此为满足，1935 年，日本又制造华北事变，策动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蒋介石在日本的压力下，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一个这样具有半独立性质的地方组织，并不是日本的最终目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企图通过华北五省自治来实现其侵吞我大片领土的目的。

为了达到侵占我华北的目的，1936 年 5 月，日本急剧增加其在华北的军事力量，日本利用换防的机会，将中国驻屯军由 2000 人增加到约 6000 人，并任命田代皖一郎中将为司令官，全权指挥华北日军。

日本在增兵后，积极抢占我方军事战略要地，日本盯中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北平南郊的丰台。1936 年 5 月，日军开始在丰台建筑房屋，接着在 6 月底和 9 月中旬，分别制造了两次丰台事件，迫使中国守军撤出丰台，达到了其独占丰台的目的。日军占领丰台后，为它的下一步侵略行动夺取了有利的据点，大大加剧了华北的紧张局势。

日本侵略军在占领丰台后不久，就以营舍不够居住为由，图谋在丰台至卢沟桥一带 60 多公顷的土地上，建筑兵营及飞机场，以便控制卢沟桥。为此，日军 10 多次不休地要中国出租或出卖这些土地。这个阴谋虽由于当地居民的坚决反对而未得逞，却从此隐伏着进攻卢沟桥的契机。

此后，日军便以卢沟桥的附近作为军事演习场所，进行有预谋的演习，逐日不断地训练示威，由白天演习渐至夜间演习，由虚弹射击渐至实弹射击。中国军队对此提出抗议，但日军均置若罔闻，经过多次交涉，日方才允许如有实弹演习时事先通知，但日军仍时常有小规模部队出动示威。

1937 年 7 月 6 日，日军驻丰台部队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卢沟桥以西的长辛店地区演习，中国守军不许，双方相持达 10 余小时，至晚，日军始退去。7 日，日本军队又在卢沟桥附近实弹演习，一直至晚间。当晚 10 时左右，忽有数声枪响发于宛平县城东门外，城内的中国守军当即加以严密注视。不久，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以电话向冀察当局提出：“有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演习部队一时纷乱，结果失落日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失兵”。并声称，如果中国方面不允许，日军将以武装卫护队伍进入城内。中国驻军认为，当时已是午夜，居民皆已入睡，而且夜间宛平城门已闭，日兵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因此，中国方面拒绝了日军进城的要求。

事实上，枪声方向是在宛平城东门外，那里没有中国驻军，就是城内守军也没有开枪，守兵所带子弹一发不少。所谓失踪士兵一名，各处搜寻也无踪影，显然是日军别有企图而制造的谣言。

这时，冀察当局也得到宛平县驻军及专员的电话报告：日军约 500 余人和大炮 6 门，由驻丰台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率领向卢沟桥进发，日军已对宛平县城采取包围形势，架起机枪，作好了战斗准备，事态已经甚为严重。可是，

冀察当局在接到报告后，不但毫无抗议表示，反而忍辱要求日方派人同中方人员一起前往宛平调查，等情况调查清楚后，再商谈处理办法。中国方面即派河北省第四区行政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周永业等人，日本方面则派出冀察绥署顾问日人英井、日军辅佐官寺平和秘书等人。双方调查人员刚刚动身，日本军队 300 余人即抢占了宛平县城东北角的沙岗，并炮轰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军队。

7 月 8 日晨，4 时许，调查人员到达宛平县署，4 时 30 分，双方正在会商调查办法，这时，忽闻东门外枪声大作，顷刻间，西门外也响起大炮和机枪声。日军木田口联队长亲率步、炮兵 400 多人，发起攻城。中国守军奋起还击。这次战斗开始不久，日军即占领了平汉线上的卢沟桥铁路桥及回龙庙等处。

面对日军的进攻，驻守该地的二十九军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无不义愤填膺，誓死捍卫祖国，他们纷纷表示：卢沟桥是吾人之坟墓，吾要与桥共存亡，绝不后退。士气非常高，涌现出许多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英雄人物。拂晓时分，日军炮击县城，金振中营长率领一队士兵，用绳梯爬出城外，兵分两路，一支经卢沟桥绕到西边，一支到铁桥东边，向日军反击，一直激战到上午 9 点多钟。当枪声停止时，中国守军便积极布防，构筑工事，准备坚守。

双方的调查和交涉毫无结果。8 日上午 11 时，日军再度开火，中国守军进行还击。不久，双方停止战斗，交涉在继续中，而这个时候，日军不断向宛平增援。驻天津日军司令部得到报告后，8 日晨 6 时紧急开会，并调步兵 300 余人乘车赶往宛平。由山海关运一列车日军到丰台，午后 1 时许，又有一列武器弹药专车开到丰台。

8 日下午，3 时许，战事再起。4 时左右，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派人送信约中国调查人员出城商谈，并要求中国驻宛平军队在即日下午 6 时前退至城外，否则即以大炮攻城。中国军队当即回复日军，双方先行停火，否则在开战中双方不便商谈，如果日军不肯停止射击，中国军队也不能坐以待毙，当予以坚决反击。晚 6 时 5 分，日军大炮攻城，双方战斗达 3 个小时，至夜间，战事更为激烈。尽管日军割断了宛平县城和外面的联络电话线，守城的士兵，不管上面的命令是什么，仍是奋勇杀敌。此时，驻西苑中国军队一个旅，由旅长何基沣率领，开到八宝山，向五里店、大井村方面截断日军后路。

晚 12 时，中国军队冒着敌人炮火，展开反攻，实行夜袭。从西边长辛店打过来的吉星文团的广大士兵，手持大刀、手榴弹，奋力冲杀，砍杀声、呐喊声、爆炸声，震动四野，卢沟桥上日军被歼殆尽，杀得敌人胆战心惊，惊呼：“宛平虽小，守军太猛，数攻不下。”7 月 9 日晨，河岸居民见桥上桥下躺着的是日军尸体，守桥的已是中国二十九军的士兵了。

二十九军广大士兵在装备和其他条件都远比日军差的不利条件下与敌作战，士气却很旺盛，特别是受到人民群众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援，更增强了他们抗战到底的决心。他们顽强抵抗，英勇杀敌，不少受伤官兵不下火线，有一个 19 岁的士兵，一连砍死了 13 个日本士兵，还活捉了一人。当日军以战车向中国守军阵地冲来时，二十九军以一个连的兵力，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前进，终于将九辆战车全部打退。他们用大刀和步枪，打退几百名敌人的进攻，使装备精良的敌人闻风丧胆，边些都显示了二十九军广大士兵坚决抗敌、不愿作亡国奴的决心。

吉星文团长在对前线采访的记者介绍战争情况时说：“ 军人守土有责，人若犯我，我们绝不能毫无抵抗。这次作战……最显著的是民众十分踊跃支持军队作战，宛平城内大部分居民没有逃跑，愿为我军挖战沟、筑工事，挑水、烧饭，协助部队作战。连日，北平青年学生和妇女团体到前线慰军者络绎不绝。其次，是士气高昂，前所未有。官兵在作战中负伤后，都不愿后撤，认为若一撤下火线即丧失此千载难逢的抗敌机会。例如金振中营长，大腿给敌人炮火打伤了，也不下火线，并坚决表示，要带一连人战死在卢沟桥上。中国有此民心和士气，深信我军抗战必胜！”

中国军队的英勇回击，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7 月 9 日晨 4 时，日军松井机关长通知中方代表说：“ 失踪日兵业已寻到，现在可以和平解决。 ”中方信以为真，与日方谈判，商定了三项停战办法：（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宛平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另由冀北保安队担任，人数限 300 人，定于 9 日上午 9 时左右接防。协定 5 时达成，6 时，日军却悍然撕毁协议，公然向宛平城发炮 70 余发。乘疏而不备，给中国军队以杀伤。日军炮轰宛平后，又诡称拥护撤军，日方外交人员三人，带着香槟酒进城，庆祝和谈成功，向中国军队致歉等。同时，却破坏协议，阻止保安队接防。最初，他们只准冀北保安队 50 人入宛平，限每人带步枪一支、子弹 30 粒；经交涉，直到下午 7 时，保安队才有 200 人进城，但仍不许带机枪。当中国军队遵约撤出宛平后，日军在城外东北角沙岗却仍有 300 余人未撤。

7 月 10 日，凌晨 2 时 30 分，隐藏在宛平东北角的日军开枪射击，复图攻城，同时，日军已由天津、通州、古北口、榆关等地陆续开至丰台增援，并有飞机、大炮、铁甲车、坦克多辆。与此同时，日军占领了大井村、五里店，切断了北平至卢沟桥的公路，并将河边旅团长的司令部设在丰台。10 日下午，日军开始包围宛平，同时向八宝山、卢沟桥的中国守军猛攻，从下午 5 时激战至 11 日凌晨，特别是 10 日晚 10 时半至 11 日晨 2 时半，在八宝山跑马场附近的战斗更加剧烈。

11 日，日本近卫内阁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暂向华北派出三个师团，派遣兵力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威力，同时，日本政府公然宣布，“ 政府已下定重大决心，关于派兵华北问题，决定采取应该采取的必要措施。 ”11 日夜间，近卫首相请了政界财界代表到总理官邸，采取了说服政府的决心，并要求他们合作的异常措施。根据日本政府的这个方针，日本军队兵分三路，向平津集中，一路是从关外以北宁路为动脉经榆关向西南运输；一路从热河平古大道向南运输；一路从塘沽海口经天津向西运输。三路增兵汇集在卢沟桥一带，逐渐达到 2400 人，并包括各种特种兵。战争在继续，战火在蔓延，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狼子野心已暴露无遗。

在卢沟桥事变中，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日军在卢沟桥地区，杀人放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他们在桥头严格盘查每个过往行人。对妇女，他们脱光衣服搜身，恣意污辱；他们任意杀害过往行人，一位名叫吴老二的农民，没向日本侵略军行礼，被日军用刺刀捅死。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手段是残忍的，除枪杀外，还有刀挑、活埋、火烧、放狼狗咬。有的日军还以杀中国人取乐。一天，一位郭姓老人在地里拾柴禾，两名日本兵把他当活靶子打，枪杀后，一名日本兵夸耀：“ 我的枪法大大的好！ ”说完两人哈哈大笑。日本侵略军就是这样残酷地屠杀中国人民，仅以卢沟桥

地区老人童德林亲眼所见，在卢沟桥北边一条 30 多米长、七八米宽、一人多深的沟里，塞满了中国老百姓的尸体，至少有七八百具。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暴行，激起了卢沟桥人民和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守卫在卢沟桥边的中国士兵，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英勇抗敌，用鲜血谱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灿烂的第一页。

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的滔天罪行，极大地震怒了广大中国人民，全中国人民一致要求实行全民族抗日，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赶出去。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即 1937 年 7 月 8 日，便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严正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庄严的号召：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通电》赞扬二十九军冯治安部的英勇行动，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即援助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三军，准备应战！

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叶剑英等人，代表红军全体指战员，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明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要求蒋介石本着：“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并表示我红军将领：“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此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敢请我国民政府，速调大军增援我河北英勇抗战之二十九军，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为授命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7 月 30 日，延安的共产党员，机关干部，召开了紧急会议，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毛泽东同志向到会各界群众发表演讲，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要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7 月 15 日，朱德发表《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指出：“九一八”事变的号炮又在卢沟桥响起了，日本法西斯的铁蹄又在驰骋于我华北土地上了，又在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土地了！他号召全中国人民立即动员起来，“血的侵略只有以血的还击来回答”。我们只要全国上下一致，齐心协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就有生存的出路。中国共产党及领导下的红军，它的职志是抗日救国，是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以解救人民于水火为己任，“我们愿意开到抗日的前线上去，愿意与宋哲元、冯治安将军领导下的二十九军赤诚合作，把日贼驱逐出去”。朱德充满胜利信心地说：“最后的胜利是我们中国人的！”

为了实现《通电》中提出的国共两党亲密合作、联合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曾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朱德、林伯渠等代表，同国民党的代表顾祝同、张冲、陈立夫、宋子文、邵力子、蒋介石等，在西安、杭州、

庐山、南京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1937 年 7 月 15 日，中共代表赴江西庐山，再次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

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战，表示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解放事业的赤诚，中共中央在《宣言》中向全国郑重声明：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行动、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权，实行民权政治。

（四）取消红军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击，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这一切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态度。

1937 年 7 月 23 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在抗日战争中有两套方针、两条路线，因而也就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而坚决抗战的办法，就是全国军队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实行抗日外交，改良人民生活水平，实行国防教育，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更加紧进行军事训练、以及抗日的政治动员，迅速集中，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奔赴抗日最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坚决的力量，它的言论与行动，激励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忱，极大地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

日本的侵略，改变了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关系，迫使它们“亮相”。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最终目的旨在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这样，就造成了对中国生存的严重威胁，于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亲英美派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卢沟桥战争开始后，立即派出代表，四处游说，争取英美的支持。

1937 年 7 月 13 日，国民党政府即向“国际联盟”送出一个声明，请求“国联”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必要的行动。稍后，蒋介石又以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名义，与各国驻华使节会谈，其中有美、英驻中国大使许阁森等人。蒋介石提出：现在的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设法，或可变为缓和，而东亚和平方可维持。蒋介石呼吁：美国是“九国公约”的发起者，在国际法上、在道义上，都有协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的义务。

当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英美帝国主义方面、幻想通过和平外交的方式来解决卢沟桥事变的时候，全中国人民，尤其是华北前线的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已忍无可忍，人民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对日作战，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 1937 年 7 月 17 日，在江西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准备抗日的方针和政策。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的主要内容是：“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 500 年的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整个中国国家的问题，此事能否解决，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到了最后关头，“再不容许我们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

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放弃了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了。”“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徬徨不定，妄图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在庐山谈话中，蒋介石提出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个条件，即：

第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第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第三：中国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第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最后，蒋介石说：“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应该说，是国民党政府多年以来在外交问题上的第一次比较正确的宣言。它表明，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在卢沟桥事变后开始转变到实行抗战的政策。这是因为，全国人民抗日高潮对他们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起来抗日。否则，人民怒潮将动摇其统治；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进攻和坚决灭亡中国的政策，威胁着他们的政权和财权。因此，在抗战初期他们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抗日积极性，表示抗战的言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都是欢迎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周刊》，曾对蒋介石庐山谈话给予了充分评价。

但是，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并没有全面、彻底地转变。这是因为国民党的一切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蒋介石被迫宣布抗战，是为了这个目的。同样，为了这个目的，它必然害怕和压制人民群众起来抗日，仍然企图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因此，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还说：“在和平根本绝望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杀我人民，占我国土，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听吧：

> “卢沟桥上的石狮在怒吼，
> 卢沟桥下的水在奔流，
> 战吧！
> 我们快用全面的抗战，
> 把民族的敌人赶出神州。”

这是中华民族的战斗呼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击日寇的运动，它振奋了全国人民，全国人民也热烈支援着北平的抗日斗争。各地人民纷纷动员和组织起来，积极开展抗战的活动。

全国舆论界，强烈主张抗击日本侵略者，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抗战救国言论，要求国民党代表民意，立即对日作战。一些报纸大力惊呼：

“时急矣！势危矣！全国上下速起下最大之决心，作最后之牺牲，中国之存亡，悉在此一举！”

“现在和平已经绝望了，牺牲已到了最后关头了。”“今日中华民族之出路，唯有努力自卫，抗战图存，从死里求生，庶能转危为安，保家保国。”

有的报纸公开批评国民党，自“九一八”以来，采取屈1290辱外交，不敢进行抵抗，造成主权日损，日寇得寸进尺，而堂堂中国，“浴尽世界别国的非笑。”希望国民党政府以大局为重，放弃错误国策，坚决作到：

一、对全国军队下紧急动员令，使它们可以随时奉令开到前线杀敌；

二、积极组织民众，并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三、排除一切媚日分子，肃清一切汉奸卖国贼。

四、释放全国政治犯，使一切爱国人士都有机会为国效力。

在全国抗日热潮的推动下，二十九军广大官兵奋起抗日。

1937年7月28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南苑、西苑和北苑发起总攻。进攻南苑的日军有1万多人。他们在20架飞机的掩护下，向南苑团河扑来、驻守该地的是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广大爱国官兵在副军长佟麟阁的指挥下，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直到奉令向城内撤退。在撤退途中，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不幸遇难，在南苑军训的1000多名大学生也大部分阵亡。

南苑失陷后，北平危在旦夕，宋哲元看到大势已去，已无继续守卫北平的意义。当晚，举行了高级军事会议，决定暂时放弃北平，到外围作战，以期收复北平。宋哲元留下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与敌周旋。二十九军在当天夜间撤离了北平。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北平沦陷了。张自忠机智地逃出北平，奔赴抗日前线，成为叱咤风云的一代抗日名将，但后来不幸在宜枣战役中以身殉国。

就在二十九军撤退的那天夜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万余人激于民族义愤，在张庆余等人带领下，宣布起义，向日本侵略者发起猛烈进攻，打死日本军队及汉奸400多人，焚烧了日本人的房屋和机关，但由于事先没有和二十九军联系，在日军围攻下，不得不放弃通州，撤至保定和二十九军会回，共同抗击日军。

平津陷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平津人民利用各种灵活机动的形式，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军，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有力地配合了后来的全国抗战。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

“七七”抗战的枪声，引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圣火，熊熊的烈火，化为无比巨大的力量，把中华民族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父教其子、兄勉其弟、妻子送郎、共赴国难的空前伟大的民族抗日战争。

卢沟桥的枪声，彻底打碎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和平幻想。国民党感到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合作无以抗日，它顺应历史潮流，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捍卫主权。

卢沟桥的枪声促使国共两党、全国各阶层、各民族的大团结。正是由于这种全民族的觉醒和全民族的抗战，经过八年的苦战，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洗刷了近百年来中国人身上的耻辱，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新篇章，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南昌起义

1927 年 8 月 1 日凌晨，南昌城里，突然间枪声大作，一队队士兵冲杀向前，喊声震天。整个南昌城震动了，沸腾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事情还要从几年前说起……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鉴于自己的最低革命纲领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纲领有相通之处，便在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下，实现了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两党共同担负起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使命。

统一战线内部，贯穿着争夺领导权的斗争。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投机革命的蒋介石，便加速了夺取领导权的步伐。1926 年 3 月，蒋介石一手制造了“ 中山舰事件 ”，诬陷“ 共产党阴谋暴动 ”，下令拘捕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包围共产国际顾问住宅；5 月蒋介石又纠集国民党右派分子提出所谓“ 整理党务案 ”，规定共产党人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的部长；6 月他又窃取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这样，北伐前夕，蒋介石已夺取了党政军大权，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

1926 年 7 月 1 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的 8 个军，兵分三路，相继挥师北伐，只用半年时间，北伐就取得惊人进展。这年年底，已先后歼灭吴佩孚、孙传芳两部军阀的主力，控制了苏、浙、皖以外的南方各省。

1927 年 3 月 21 日,周恩来等人领导 80 万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艰苦战斗，解放了上海。而蒋介石嫡系第一师却不费一枪一弹开进了大上海。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自感羽翼丰满，便向着同盟的共产党人举起了无情的屠刀。

3 月 26 日，蒋介石来到上海，在江浙财阀和地痞流氓的支持下，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成了蒋介石“ 总司令部 ”的少将顾问，跻身于上海军政要人之列，蒋介石还将进驻上海的北伐军调往南京，而以对人民革命非常仇恨的周风岐部接防上海。

正当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步步加紧的时候，共产党中央领导人陈独秀为了推迟蒋介石的叛变，于 4 月 5 日，同假左派汪精卫一道发表联合宣言，极力表白对蒋介石的信任。宣言说：“ 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纠察队，这类谣言不知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 ”

但是，汪陈宣言没能拖住蒋介石，却使共产党人受到麻痹，陷入了极大被动。一场大屠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4 月 12 日凌晨，经过策划，一批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突然间武装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纠察队被迫自卫还击。落介石借口调解“ 工人内矿 ’，让军队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有 2700 多工人纠察队员被解除武装，冲突中 120 人牺牲，180 人受伤。当日下午，又有一批流氓党棍强占了上海总工会，总工会向全市发出总罢工的命令，进行抵抗。4 月 13 日上午，10 万群众在闸北青云路广场集会，列队向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发回枪支，释放被捕工人。当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突然遭到第二师疯狂的机枪扫射。当时，正值天降大雨，宝山路顿时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这就

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共政变。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汪精卫在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峙。

接着，反动军官纷纷叛变，跟随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7月15日，汪精卫与蒋介石合流，密令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开刀，猖狂叫嚣“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

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孙炳文、李大钊、萧楚女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及数以千计的革命群众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一时间，中国陷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中。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反动派的疯狂屠杀所吓倒，他们从血泊中站起来，揩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成立，宣布共产党退出国民政府，继续从事反帝、反新旧军阀的斗争。同时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向反动派打响复仇的第一枪。

1927年7月27日，一个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青年人秘密来到武汉，住进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家里。此人正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他受党和人民的委托，在危机时刻挑起了组织领导南昌起义的重担。

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以“东征讨蒋”的名义，将属于张发奎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的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由武汉、鄂东一带向九江、南昌集中。此时的第二十四师，由叶挺任师长，已完全为我党所掌握。贺龙所率第二十军，在党的政治工作影响下，革命情绪也十分高涨。

二十军和二十四师的行动，引起了汪精卫的猜疑。在九江，他和几个反动军官阴谋策划，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去庐山开会，妄图趁机解除他们的兵权。叶挺、贺龙没有执行张发奎关于去德安集结的命令，而是率领部队浩浩荡荡开向南昌，准备发动起义。

叶挺部与贺龙部的到来，受到南昌人民热烈欢迎，人们组织起纠察队、运输队、招待站等，南昌城革命声势非常高涨。

7月27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位于市中心的江西大旅社正式组建，并决定于30日举行起义。第二天，周恩来亲自前往子固路华圣公会第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周恩来把中央前委关于立即举行起义的决定和具体行动计划告诉了贺龙。此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已经数十次积极寻找党组织了。他当即毫不含糊地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当即代表前委任命贺龙为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

30日下午，一次特殊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在第二十军指挥部举行。会上，贺龙严肃地说：“今天召集大家来，有件重要的事情谈一谈。大家知道，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起革命的旗帜，打倒蒋介石。我们在一块都很久了，根据共产党的命令，我决定带领部队参加起义，你们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军官们听了这话纷纷表示：“军长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坚决跟着走。”贺龙脸上露出微笑，点了点头说：“好！我们今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服从共产党的命令！”接着，他向军官们宣布了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和部署。

同一天下午，百花洲畔，叶挺在第二十四师指挥部里，召集了全师营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在严肃而机密的状态下进行。叶挺传达了党的决定，他说：

“宁汉合作已成定局，汪蒋联盟的反革命大阴谋已经表面化，革命遭到严重挫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一部分领导人已赶到南昌，准备实行武装起义，粉碎反动派的联合阴谋，回击敌人的进攻。”与会的40多名青年军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他们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因而听了叶挺的话不禁摩拳擦掌，群情振奋。随后，师参谋长徐光英报告了作战计划，他说：“我们和第二十军一起行动，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但是敌人有增援部队，有的24小时即可到达，有的两天内可以到达。如果让敌人增援部队到达，战局就复杂了，下一步行动就有困难。因此，要求在一个夜晚解决战斗。”

武装起义进入实施阶段，张国焘却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于7月30日跑到南昌，阻止起义。起义日期不得不推迟，前委召开紧急会议，与张国焘展开激烈争论，张国焘曲解中央及共产国际的意见，认为起义必须依赖张发奎，征得他的同意，否则不可动。这种错误主张遭到强烈反对。周恩来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起义不能推迟，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受汪精卫的影响很深，他是不可能同意我党起义的。我们必须独立地进行革命。”其他人也纷纷驳斥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但张国焘仍固执己见。

31日上午，前敌委员会接着开会，又辩论了好几个小时。恰好这时，有人从武汉带来有关汪精卫、孙科到庐山召集“分共”会议的消息，因此，是否起义的问题已没有讨论的余地。张国焘自知理亏，放弃了原来的意见，但认为应该把起义再推迟一两日，以便通知仍随张发奎行动的共产党员。然而，形势已万分危急，刻不容缓，任何拖延都可能导致起义的夭折。最后，前委会决定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起义。起义命令由叶挺起草，以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的名义发表。

在前委会激烈争论的同时，起义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起义前夕，各部队指挥员有计划、有目的地对敌情和作战环境进行了侦察。由于敌我双方同属国民革命军系统，同驻一地，甚至同住在一座营房中，官兵中或者在黄埔军校中同过学，或者在广州、武汉时就相互认识，所以起义前夕的侦察工作多用会朋友、拜访友军等名义进行。可以说，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摸清情况后，各部队于31号晚以“移防”、“打野外”等各种名义进入战斗发起地点。城内各处首脑机关全部处于起义军的严密监视之下。整个南昌城实际上已处于颈系红领带、左臂扎白毛巾的起义军的控制之中。

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贺龙向前委报告了一个意外的情况：第二十军第一团有个姓赵的副营长叛变了。前委会果断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凌晨2点。

起义爆发前夕，根据前委的安排，朱德执行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从这天下午开始，朱德利用和滇军的旧谊，在一家饭馆里，设宴招待两个敌军团长，吃完饭后，又接着打麻将。

拖到晚上9点多钟，有个滇军青年军官心神不宁地推门进来，说外面有要解除滇军武装的消息。朱德听后，哈哈一笑，说“在这乱糟糟的时候，真是什么样的谣言都有。大家请接着打牌，用不着操心。”这样，又延迟了一段时间，客人们才相继散去。朱德拖住这几个军官，为起义部队迅速解除这两个团的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种种原因，战斗在2点之前打响。

凌晨1时左右，一阵清脆的枪声响彻沉寂的夜空。这是复仇的枪声，这是正义的枪声。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

周恩来的指挥部设在一所学校里，代号“炮兵连”。战斗打响后，“炮兵连”电话不断。周恩来以他那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冷静地指挥着各路起义部队。

贺龙、刘伯承指挥第二十军第一、二团向朱培德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发起进攻，激战 3 小时，占领了敌人的指挥部和省政府。

顺化门外，第二十军教导团和第六团负责解决敌第九军第七十九团。战斗打响后，他们迅速包围了敌人，发起攻击，把敌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乱作一团，大部分士兵还睡在梦里便稀里糊涂地作了俘虏。

叶挺指挥的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在松柏巷一带，与敌第六军第五十七团展开了激战。在起义军的强大火力攻击及政治攻势下，驻守松柏苍天主堂和匡庐中学的敌军终于支持不住，纷纷缴械投降，作了起义军的俘虏。

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在广东农军的配合下歼灭了敌第三军第二十四团，然后向敌第二十三团发动攻击。敌二十三团遭到袭击后欲突围，第二十四师教导队中队长陈守礼带领十几名战士英勇地阻击敌人。在短兵相接的激战中，起义军的几个战士牺牲了，陈守礼也身中数弹倒在地上。及时赶到的增援部队击溃了敌人，救回了身负重伤处于昏迷之中的陈守礼，此时，他已是奄奄一息了。一阵激烈的枪声使陈守礼又从弥留中惊醒过来。他轻轻蠕动双唇，发出微弱的声音：“敌人解决了吗？怎么还有枪声呢？”守护在他身边的同志感动地流下泪来。这时，敌人吹响了表示全团停止抵抗的号声，陈守礼才闭上了双眼，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战士们举起右手，向这位可歌可泣的英雄致敬……

战斗持续了 5 个多小时，到早晨 6 点钟左右，全部解决了南昌市内和近郊的敌军。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胜利的红旗飘扬在南昌城的上空。

8 月 1 日清晨，起义官兵、党政干部和许多群众，在总指挥部门前的广场举行了一次集会。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与大家见面。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英姿勃勃地登上总指挥部门前的台阶，向大家连连招手。他以坚定、洪亮的声音说：“革命靠军阀部队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来打倒反革命。现在，我们起义成功了，从此，这里的军队归共产党领导了，我们共产党人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第一支军队！”

同日，在聂荣臻的领导下，驻马回岭之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全部、七十四团重机枪连、七十五团三个营，也胜利地实现了起义，于 2 日到达南昌。

起义胜利后，在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于江西省政府西花厅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首先，由叶挺报告起义经过，接着，讨论通过了《联席会议宣言》、《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以及由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签署的《中央委员宣言》等文件，最后，推举出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谭平山、宋庆龄、周恩来、恽代英、郭沫若、吴玉章、林祖涵、贺龙、叶挺、张国焘、徐特立、李立三、彭湃、苏兆征、邓演达、何香凝、于右任、彭泽民、江浩、陈友仁、朱晖日等 25 人组成，委员会推举谭平山、宋庆龄、郭沫若、贺龙、恽代英、邓演达等 7 人组成主席团，为最高执行机关。

起义后的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

下辖三个军：第九军，军长韦杵、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原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起义军，未获结果，后将第二十五师拨归朱德指挥）。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下辖三个帅：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南下开始后，在进贤率队叛逃）；第二十四师，师长古勋名（后为董朗）、党代表颜昌颐；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廖于吾，下辖三个师：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良；第二师，师长秦光远，党代表陈恭；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以上共 16 个团又四个营，总计 3 万余人。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南京、武汉两个国民政府大为惊恐，他们立即纠集力量，进行疯狂的反扑。

8 月 3 日，武汉政府通令全军镇压起义部队，命令张发奎、朱培德部全力向南昌反扑。起义部队按原定计划南下，准备到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于 8 月 3 日到 5 日，分批撤离南昌，由赣东南下，经寻乌直取东江入粤。

8 月 5 日，张发奎部向南昌进攻，8 日，进入南昌。

8 月 7 日，起义军到达临川，军阀杨如轩部约 2000 人，仓皇逃往南城。起义军稍事休息后，即南下宜黄、广昌。之后，以第十一军为右纵队取道宁都，第二十军为左纵队取道石城，到壬田会合。25 日，在壬田击溃钱大钧部两个团，26 日，攻入瑞金。这时，蒋介石和李济深调集的钱大钧、黄绍竑两部约 1.8 万人，正向于都、会昌一带集结，准备围攻起义军。前委决定，趁两股敌人尚未靠拢之机。主动进攻会昌，消灭钱大钧部。28 日，叶挺率十一军取得洛口，对会昌发起进攻，30 日午后 5 时，起义军攻入会昌，钱大钧部向南逃窜。同时，黄绍竑部亦被击溃，这一仗，共缴枪约 2500 支。

会昌大捷后，起义军为解决伤员，辎重运输困难，又折回瑞金，改道入闽，经汀州、上杭，沿汀、韩二江南下，直趋潮汕地区。9 月 19 日，起义军主力进占大埔，为保护南下部队侧背，监视梅县方向敌人，起义军决定分兵，将朱德指挥的周士第二十五师留驻三河坝，其他各部向潮汕进发。24 日，起义军占领潮汕，钱大钧、黄绍竑部亦由赣东南进入粤东。起义军为回师打击钱、黄两部，乃令周逸群率第三师和革委会警卫团留驻潮汕，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第一、二两师共 6000 人左右，回师迎敌。27 日，由揭阳向汤坑进发。28 日，击退薛岳部，29 日，进入汤坑后，方知已处于广东军阀陈济棠、薛岳等三倍于己的敌军包围之中，起义军经两日激战后，撤出战斗，退往揭阳。由于起义军兵力分散，于汤坑战斗的同时，潮州、汕头也相继失守。

起义军的主力在广东潮、汕地区作战受挫后，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一部分在董朗等人的率领下，进入海陆丰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坚持斗争，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及第九军的一部分则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艰苦转战于闽、粤、赣、湘边界，他们在无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建设和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武装斗争等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的策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独立进行了中国共产党从城市转入农村的历史性转折的尝试。

朱德和周士第等指挥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部队正在三河坝与钱大钧部等进行酣战之际，得知潮、汕受到黄绍竑部攻击的消息后，便立即根据总指挥部预定的计划撤出战场，准备驰援潮、汕。

10 月 5 日，两部除担任掩护任务而留在三河坝的第七十五团一部外，其

他共约 2000 余人到达饶平县境的大上峰、水牛子、下祠一带。中共饶平县委书记杜式哲立即赶往部队驻地表示欢迎，并组织群众给部队送茶送饭。

此时，第二军第三师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从潮州突围出来的 200 余人，在奔赴三河坝会合第二十五师的途中经过饶平县境，两支部队不期而遇。朱德、周士第这才得知潮、汕已失守，革命委员会等首脑机关去向不明。在有周士第、李硕勋、陈毅、周邦采等各路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朱德指出：反动派在东江地区陈兵数万，其势汹汹，随时都有向起义军扑来的可能。因此，起义军只有迅速脱离险境，保存有生力量，才能图谋新的发展。他认为，在三河坝激战时，部队寄希望于前线，现在前方主力已完全失利，希望变成了失望，在这群龙无首的局面中，必须另寻出路。他向大家表示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种子保留下来，有信心把这支部队带出去，和同志们团结战斗，把革命进行到底。朱德的意见，得到陈毅的赞同，大家一致决定，积极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部队避开敌军主力来攻的方向，从东北方向迂回穿插，向闽、赣边界方向引退，加强政治动员，稳定军心。

部队在饶平时，从中共饶平县委书记杜式暂处得知，中共饶平县委准备组织农民军攻打县城，但农民军仅有千人，几十支枪，力量单薄，朱德便决定派出第九军 300 余人，帮助农军攻下了县城。

两日后，朱德、周士第等率领部队，由当地的中共党组织派人带路，向福建境内的平和县方向进发，后经永定、峰市进入武平县境。在这一段行程中，没有发生什么重大战斗。

10 月中旬的一天，部队到达武平县旧城郊外，这时，敌军已发现这部分起义军的动向，钱大钧部约一个师紧紧尾追于后，起义军为摆脱这股追敌，在朱德等的指挥下，预先埋伏在城外要隘，出敌不意，一举击退其两个团，选小路迅速西进。

最后，在朱德、陈毅带领下，起义军撤出广东，辗转至湘南，于 1928 年 4 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南昌起义，震动了全国，震动了全世界，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拉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伟大序幕。

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开始。1933 年 7 月 1 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决定以每年的“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建立的纪念日，即人民军队诞生的光荣节日。

“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1 年 9 月，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使日本侵略军至 1932 年 2 月轻而易举地初步完成了对中国东北四省的占领。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上海的工人、学生和人民群众，曾多次组织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抵制日货，集会示威，全市抗日运动日益高涨。与此同时，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和驻沪的日本官员，也多次集会，狂妄叫嚣要坚决惩罚坚持抗日的中国人民。

日本人乘机竭力扩大事态。19 日半夜，日本指挥官田中指使日本宪兵重藤千春大尉指挥上海的“日本人青年同志会”，趁黑夜袭击了曾建立过抗日组织的三友实业社总厂，放火烧毁了厂房、工房和仓库。此后，这伙暴徒还与华籍巡捕发生冲突，行凶砍死两人，重伤两人。日本暴徒在与巡捕冲突中，也被打死一人，重伤两人。

在这一连串的暴行之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反而于 21 日又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赔礼道歉、惩凶、赔偿、立即解散抗日团体等 4 项无理要求。

吴铁城被迫在 28 日下午 3 时 15 分表示全面接受日本的 4 项要求。

然而，蓄意在上海制造事端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满足。

在吴铁城全面接受日方无理要求的 5 小时又 15 分钟之后，日本又提出了早已准备好了的一项新的通牒，声称：为了保卫日本侨民的安全，日本海军决定派兵进驻上海，并要求中国军队尽快撤出上海的闸北地区。但在尚未得到中国方面答复时，日本海军陆战队 2000 人已按预定的作战计划，于 11 时 30 分，在北四川路西侧，以及天通庵路、青云路、横滨路等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当时还未及撤离防地的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一五六旅，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奋起抗战。由此，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就在日军的不宣而战下爆发了。十九路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淞沪抗战。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驻京沪地区的中国军队是十九路军。1931 年 10 月，十九路军由江西赣州“剿共”前线调戍京沪地区。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戴戟任京沪警备司令。全军下辖第六十师，驻防苏州、常州一线；第六十一师，驻防南京、镇江一线；第七十八师，驻防吴淞、闸北、南翔一线。全军共 3.3 万多人。

11 月初，十九路军卫戍京沪后，在上海人民坚决抗日行动的推动和影响下，抗日决心是坚定的，但在组织上、实际准备很不充分。当时十九路军到沪不久，对敌情知之甚少，而南京国民政府抱定不抵抗主义，并未向该军提供任何有关敌情，直到该军从自己获得的情报中判断出军日发动侵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才于 1932 年 1 月 15 日开始进行应战的军事部署，而此时距日军发动进攻的时间尚不足两周。

由于日军侵略形势的日趋严重，1 月 23 日，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戴戟主持下，召开了驻沪部队紧急军事会议，一致决心保卫上海，讨论和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并向全军各部发出了：“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为目的，应严密备战。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的密令。

24 日，蔡廷锴等到达苏州，又召集驻苏部队高级将领举行紧急会议，传

达和解释了 23 日发出的密令，驻军将领也一致拥护。

日本海军发出要求中国方面撤退闸北驻军的通牒后，不待中国方面回复，即令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登陆，同时命令上海陆战队迅速按预定计划作好进攻准备。

第十九路军总部在接到关于日军发动进攻的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星夜赶至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 日 1 时，蒋、蔡、戴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表明了第十九路军对于日军进攻实行坚决自卫的决心。

天亮以后，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发起猛攻，日机也由航空母舰起飞，对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蔓延。守军第二五六旅所部，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以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组织敢死队以潜伏手段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阵地，并在炮火掩护下适时向敌实施反击，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在北站及商务印书馆两处起大火后，日军趁机向北站猛攻，守军与日军激战一小时后退出北站。29 日 17 时，第一五六旅主力加入战斗，进行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并乘胜追击，一度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日军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结束。

日军进攻受挫后，通过英、法、美各国领事的斡旋，于 29 日夜 20 时，向中国守军提出停战要求。中国驻军明知其为缓兵待援之计，同意停战。同时十九路军也加强部署，急令驻镇江以东之第六十师进驻南翔、真茹一线，并将第六十一师调沪，驻沪之第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严阵以待。

日军进攻闸北失败后，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的日本天皇裕仁，2 月 2 日任命伏见宫博恭王为海军军令部总长，以便处理有关战事。

1 月 30 日，日本第三特别陆战队在上海登陆。2 月 l 日，第一特别陆战队亦开抵上海。2 月 2 日，日本原有海军及新增调的舰船编成第三舰队，统一指挥进攻上海。

2 月 3 日，日军破坏停战协议，再度向闸北发动进攻，同时又以军舰 20 余艘、飞机 10 余架轰击吴淞炮台。中国守军在闸北地区击退了日军的新进攻，但伤亡较大。

2 月 4 日，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以数千人分 3 路会攻闸北，数百人攻击八字桥。但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下，日军进展缓慢，被迫于午后撤回原进攻出发阵地。同日 11 时，日军以军舰 13 艘、飞机 24 架猛烈轰击吴淞要塞。至 13 时，要塞炮 6 门被毁，炮台守备营被迫后撤，日军乘机在吴淞要塞登陆，但旋即被增援吴淞的第一五六旅击退。

5 日，日军再次进攻闸北，守军顽强战斗，阵地失而复得。日海军陆战队指挥官于 16 时下令停止攻击，撤回原阵地。至此，日军发动的第一次总攻被粉碎。

日军总指挥盐泽幸一曾扬言上海一旦发生战事，4 小时即可了事，但在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击下，狂言化为泡影，盐泽幸一本人因指挥进攻失败，被撤职回国。

盐泽幸一撤职回国以后，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接任上海日军总指挥，同时，日本陆军中央部调派陆军第九师和混成第二十四旅增援上海作战。

早在日本人制造上海紧张局势之时，日本陆军中央部即已考虑向上海增派陆军，但遭日本海军拒绝。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第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下，进攻屡遭失败，不得不向陆军求援。l月31日，日本海相认为上海附近情况不容乐观，必要时希望陆军增援。2月2日，日本参谋部与军令部达成协议陆海军在上海方面互相协作，同时命令第九师紧急动员，第十二师临时组成混成旅。

2月5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发令派遣第九师、上海派遣混成旅搭乘日本海军第二舰队所属舰艇，到上海加入第三舰队序列。同时，日本海军也增派横须贺第二特别陆战队赴援上海。

野村吉三郎接任上海日军总指挥以后，决定改变进攻闸北的计划，以主力会攻吴淞，同时以一部兵力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左冀突破。于是命令由日本国内启航增援上海的混成第二十四旅驶向吴淞口，准备攻击吴淞炮台。

吴淞是上海的门户，增援的日军欲顺利在长江口登陆进入上海，必须首先攻击压制或占领吴淞要塞地区。

增援上海的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于2月6日驶向吴淞口。为掩护该部登陆，上海陆战队从7日7时50分开始，集中全力进攻吴淞，日军先以飞机10架，沿淞沪铁路线轰炸中国守军阵地，继以陆战队分由黄浦江、军工路水陆两路，猛攻吴淞地区中国守军第一五六旅第四团阵地。同时集中军舰24艘、火炮30余门、飞机20余架对蕴藻浜车站、吴淞镇、狮子林炮台轰击，配合地面进攻。守军浴血抗击，战至12时。将日军击退。

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在上海陆战队掩护下在吴淞铁路码头强行登陆。第十九路军曾对登陆之敌实施炮火袭击，但效果不大。至晚上6点，日军登陆完毕，在徐家宅附近集结，作进攻吴淞炮台的准备。

8日拂晓，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分3路向张华浜、蕴藻浜、吴淞镇进攻。至傍晚，日军攻击达10余次，均遭失败。23时许，日军向引翔港、杨树浦、狄思威路退却。日军在进攻吴淞的同时，以一部兵力在纪家桥偷渡，企图袭击守军后路，被守军发觉击退。另以一部兵力向八字桥、江湾进攻，企图攻占江湾、大场，截断守军吴淞与闸北之间的联系，阴谋亦未得逞。

12日，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两度在纪家桥附近架桥，均遭失败。12日晚，日军利用夜暗在纪家桥附近架桥成功。13日拂晓，日军在烟幕弹掩护下强渡蕴藻浜，在曹家桥附近突破守军防线，第十九路军急调第六十师第一二二旅增援，将渡河日军包围。日军数次突围均遭失败，双方展开肉搏格斗。日军指挥官急调一部日军救援。被围日军在其救援部队接应下拚力突围，但仅有少数突围后被救援部队收容后撤，大部被歼。同日，日军在江湾、闸北地区也以一部兵力进攻。14日拂晓，日军再各以一部兵力分别进攻江湾、八字桥、青云路、天通庵路等处，均被守军击退。至此，日军已无力组织新的进攻，被迫原地固守待援，并在英、美、法、意等国公使出面调停下，再次处于休战状态。野村企图从几路包抄吴淞中国守军的计划，终被粉碎。

根据日本天皇敕令，日军参谋总长急令陆军第九师火速增援上海。13日，该师第一梯队抵达上海港。16日，该师全部在吴淞码头登陆。此时，在沪日军已达3万余人，野炮近70门，飞机60余架，并有舰艇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

18日9时，日本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与第十九路军代表会见，要求第十九路军撤退，当即遭到拒绝。于是，植田在当日下午向第十九路军军长蔡

廷锴发出最后通牒：

“贵军应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在 2 月 20 日午前 7 时前把现在的第一线撤退完毕，并应在 2 月 20 日午后 5 时前，从驻军地区撤退完毕：如不见实行，日军不得已将对贵军采取自由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

第十九路军收到日军的通牒后，立即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与会者群情激愤，怒不可遏。指挥部立即令前线部队集中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通牒的回答和警告。

此时，由张治中将军率领的第五军已全部赶到淞沪地区，作为援军归第十九路军蒋光鼐统一指挥，参加对日作战。

第五军开抵淞沪后，增强了中国军队在这一地区的防御力量。第十九路军重新调整部署，由第五军接替由江湾北端至吴淞西端之线的防务，并任命张治中为左翼军指挥官，全面负责左翼地区的作战指挥。由第十九路军担负江湾及其以南至南市之线地段的防御，以蔡廷锴为右翼军指挥官，统一指挥右翼地区的作战，并限于 18 日拂晓前完成全部调整。

张治中发表《告全军将士书》，对第五军进行动员，表示：“誓与我军将士共患难，同生死。深望我军将士，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假如日军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敌人拼命到底！

日军预料到第十九路军不会接受最后通牒，因而不待答复即于 19 日 16 时下达了进攻命令，以主力攻击庙行、江湾一线，企图将该地守军消灭于苏州河以北地区，各部于十九日夜开始行动，至 20 日拂晓前已进入进攻出发地线。

20 日 7 时 30 分，日军从正面向闸北至吴淞发起全线进攻，企图从中国守军阵地中央突破，然后袭击吴淞、闸北。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在飞机、重炮支援下，向庙行镇方向攻击，守军第八十八师部队奋勇抗击，战至 16 时，日军仍滞留于中心巷、金家宅、孟家宅地区无法前进；日军第九师右翼队和中央队在坦克及炮兵支援下，猛攻江湾镇，守军沉着应敌，战至 18 时，挫败了日军的进攻。入夜，日军调整部署，21 日再度进攻，仍无进展，且在守军火力杀伤下伤亡惨重。日军看到如此攻击损失太大，又无效果，只得以一部兵力监视守军阵地，停止攻击。

已遭到沉重打击又不甘心失败的植田，拼凑力量，调整部署，再次组织全线进攻，以求挽回败局。22 日拂晓，日军开始攻击。具有坚定抗日决心和初步对日作战经验的第十九路军指挥部，判断经过数日激战伤亡惨重、止步不前的植田，在未得到新的增援之前，他的所谓全线进攻和突破，是可以粉碎的。总指挥蒋光鼐于 9 时决心由江湾镇、庙行镇、蕴藻浜 3 个方向同时实施反突击，合围歼灭庙行镇之敌。至 15 时左右，各部到达出击位置，即全线向日军展开反突击。

第六十师由宝山路、天通庵路、中山路向日军实施佯攻，牵制日军；第六十一师第一二二旅（欠第六团）由大场镇西南向前开进，17 时即从小场庙、竹园墩地区与第八十八师部队协同向当面日军反击。第八十八师待两翼反突击部队进到日军侧背后，即实施反击。至此进攻庙行镇的日军全部陷入反突击部队的包围之中。

植田谦吉得知混成第十四旅被围后，急令师预备队救援。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在救援部队配合下，仓皇突围逃窜，第十九路军反突击部队与日军展

开白刃近战，战斗之惨烈为开战以来所未见。经数小时激战，日军大部侥幸乘夜间突围逃窜，一部被包围歼灭于金穆宅、大小麦家宅一带。由于进攻庙行方向的日军遭到第十九路军反突击的沉重打击，陷入危境，使日军全线进攻破产。第九师对江湾地区的攻击，在守军的英勇抗击和反击下，只得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据日方资料，此次战斗日军伤亡 800 余人，第十九路军（包括第五军）伤亡达 1000 余人。

22 日夜，守军恢复原来状态。第八十八师因伤亡过大，于 23 日撤至庙行镇西南一带休整，其防务由第六十一师 3 个团和第八十八师独立旅 1 个团及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接替。

第十九路军的反突击，是一次组织与实施都很成功的战役行动，是第十九路军指挥果断，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奋战的结果。中外报纸都一致认为庙行之役是淞沪抗战中战绩的最高峰。

日军于 22 日惨败后，一面请高调援军准备再次总攻，一面调整部署进行局部进攻。2 月 25 日，日军改用重点进攻突破一点的战术，分 3 路同时向江湾、小场庙、庙行猛攻。10 时许，日军突破金家塘阵地。12 时许，守军增援部队分 3 路反击，一路由江湾镇向敌左翼反击，一路由庙行镇向敌右翼反击，另一路从小场庙向敌正面反击，形成包围之势。血战至晚，日军受创突围败退，守军恢复原阵地。当天夜里，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决心于当夜全线出击，以歼灭大沈宅附近地区日军第九师主力。忽然接蒋介石电令。蒋光鼐接此电令后，遂令停止实施出击。26 日拂晓，守军为改善防御态势和收缩兵力，主动放弃突出的江湾阵地，退守金家塘至竹园墩之线。27 日下午，日军进占江湾镇。

2 月 22 日，在中日双方激战，日方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日国主帅野村吉三郎向日军统帅部发出急电：“ 目前最要紧的是利用具有相当实力的陆军迅速结束战局。现在，战局处于胶着状态，迟延一天就有贻误大局的危险。上海郊外敌人抵抗还相当顽强，此时，切盼迅速增援重兵。 ”日本陆军中央部鉴于第九师在上海的失败，同时顾及国内、国际的反战压力，决定再调 2 个师。日本陆军中央部于是决定动员和编组上海派遣军。24 日，下令组成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以前陆相白川义则上将为司令官，指挥第十一师、第十四师迅速驰援上海日军，此时日本在上海地区的总兵力约 10 万人。

白川义则首先率领第十一师先遣部队，于 29 日 7 时抵达上海长江口停泊。于当日上午 10 时下达了作战命令，白川的作战企图是以第九师在庙行镇方面继续实施正面进攻，以派遣军的主力第十一师在浏河方面登陆，迂回守军侧背，截断京沪铁路，瓦解中国守军的抵抗。

在多次增兵以后，白川统率下的上海日军已达 7 万余人，飞机约 150 架（另有海军飞机 160 架）和海军第一、第三舰队。此时，中国第十九路军（包括第五军）总兵力只有 4 万余人，并已相对减弱，右翼军损失约 1/3，左翼军损失约 1/4，防守线绵延 50 余公里，武器损耗极大，仅正面防守就感兵力薄弱。守军也准备增兵防守，但因兵力不足，数次急电求援，蒋介石仅令“ 固守 ”、“ 加强戒备 ”，却迟迟不发兵增援。在这种情况下，第十九路军无法兼顾正面与侧翼，只能集中兵力防守正面战线的真如至杨家行地段，以阻止日军从江湾方面的突破。对约 20 公里的沿江防线，仅有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个连及少数义勇军担任警戒。

日军为掩护其主力第十一师在浏河方面登陆，在庙行镇方面实施猛烈进

攻，以便紧紧拖住第十九路军主力。同时为了迷惑对方的注意力，又在多处实施佯攻，特别是在闸北八字桥、天通庵路等地展开频繁进攻。在天通庵路附近，双方激战持续达 8 小时之久，第六十师不断派敢死队跃出战壕，短兵相接，迫使日军退向狄思威路。其他各处战斗，也甚为剧烈。闸北八字桥形成拉锯战，守军阵地三失三得，伤亡很大，日军伤亡也极为惨重，遗尸累累，团长林崛上校被击毙。

3 月 1 日，日军对淞沪地区发起全线攻击。日军首先以飞机、炮兵连续轰击守军阵地，时间持续 3 个半小时，然后步兵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发起攻击。同时以舰炮袭击狮子林、杨林口、七丫口等处。7 时许，又出动飞机轰炸大场镇。守军在优势日军总攻之下，虽阵地多次被日军突破，但仍顽强与敌反复争夺。日军第九师发起攻击后，遭到守军的严重杀伤，但至下午也先后占领竹园墩及广东义地两侧端地区。

正当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与日军在整个正面战线顽强奋战之时，日军第十一师从 3 月 1 日 6 时开始，分别从七丫口、杨林口和六浜口登陆。警戒浏河地区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个连及少数义勇军，在登陆日军强大炮火和步兵攻击下，仍然顽强抵抗。第十九路军总部急调第八十七师驰援，但因缺乏运输工具，加上沿途遭日机轰炸，直至 18 时，才有一个团赶到浏河，但此时浏河已沦入敌手，日军正向嘉定方向急进。

浏河危急之时，第十九路军无机动兵力可以增援，曾请求军政部速派两师兵力驰援浏河，但军政部置之不理。浏河失陷，使守军侧面及后方均遭严重威胁，不得已于 3 月 1 日晚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

第十九路军的撤退是主动的有计划的行动，是向新防御地线的转移，始终保持着战斗的韧性。这次撤退并不是溃败。蔡将军指挥这一有秩序的战略撤退在战术上也很正确。在所有能移动的大炮都撤走以后，部队才撤出前线。几乎没有发生抢劫和混乱。撤退进行得这样安静，掩护得这样巧妙，闸北的日本海军到天亮才发现敌人已经离开，他们整夜炮轰的已是空的战壕和工事。

日军发现中国军队全线撤退后，于 3 月 2 日占领了闸北、大场、真如，3 日进抵南翔。此时，白川为在国联开会前停止作战，命令日军停止追击，并于 3 月 3 日发表停战声明：“只要中国军队不采取敌对行动，我军将暂时原地不动，停止战斗行动。3 月 3 日，国联开会决定，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至此，淞沪战事宣告结束。

在日本发动的侵略上海的战争中，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的官兵牺牲 4270 余人，负伤约 9830 余人。市民被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死亡 6080 余人，伤 2000 余人，失踪 10400 人，共计损失了 16 亿元的财产。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战争一开始，日军就出动飞机，有目的地对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文化部门进行滥炸，使中国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全部被烧毁。东方图书馆所收藏的数百万卷书籍资料，包括所藏的 10 多万册宋版、元版的珍贵古籍图书和清乾隆年间缮写的四库全书，先被炸毁焚烧，后又被日军劫掠。日军以卡车抢运烧剩的书籍达 7 天之久。

在侵略上海的战争中，据日方资料：日军陆军战死 620 名，负伤 1622 名；海军战死 149 名，负伤 700 名。

淞沪抗战历时 33 天，中国第十九路军之所以能以劣势装备，抵御住优势装备的日本陆海军的联合进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与全国各界的积极

支援分不开的。

还在事变发生的前夕，中共中央即发出紧急通知和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成立义勇军，组织纠察队”，“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展开了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和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他们动员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全国人民、海外爱国侨胞，也从各方面支援淞沪抗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上海人民特别是工人和青年学生，立即掀起参加义勇军的热潮。在事变发生后的二三天内，就有数千人登记参加义勇军。有的青年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抗日的决心。他们参加义勇军后，有一部分就立刻调到前线去，配合第十九路军作战，有的抢送伤员，递送情报，运送弹药物资。其中工人义勇军表现尤为英勇，他们甚至利用菜刀、斧头参加作战。工人组成的地雷队，在前线埋设大量地雷，杀伤不少日军，给敌人以很大威胁。沪东工人组织了一支约 300 余人的义勇军，在江湾附近协助第十九路军阻击日军 100 余人的进攻，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上海学生组织的义勇军，积极参加了前线的作战和其他战勤工作，表现也十分勇敢。复旦大学学生组织的义勇军，在天通庵路的一次战斗中，曾经有 200 余人壮烈牺牲。

广大商人、市民组成的义勇军，在支援前线作战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于 2 月 5 日到真如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带去 200 余名童子军，交由第十九路军指挥。这些童子军在作战期间，始终和部队在一起坚持工作,直到 5 月 28 日第十九路军在苏州举行追悼会后,才解散回沪复学，其中多人在前线牺牲。东北冯庸大学和华北各大学的几百名学生，以及苏北人民组织的大刀队，均以杀敌报国之心，要求将牺牲和负伤战士的武器交与他们到前线杀敌，以后被分配在长江南岸守备和到青阳港第二线构筑防御工事。

义勇军是一支坚强的、有觉悟的人民武装，在数量上亦相当可观。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十九路军中参加战勤工作的义勇军，就有 2 万余人，约占当时上海守军总兵力的一半。

上海人民除组织义勇军直接参加前线的工作以外，还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的各种工作。兵工厂工人日夜赶制军火，供应前线。前线作战部队需要大量的手榴弹，当第十九路军请求国民党政府军政部调拨遭拒绝后，上海总工会动员募集了数万只空烟罐，赶制成“土炸弹”，运送前线使用。2 月初，日军进攻吴淞要塞，以飞机和舰艇轮番轰击，守军受到严重威胁，上海工人及时送来五六百块大钢板，供部队构筑掩蔽部，减少了伤亡。凡前线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通讯器材、建筑物资、医药用品等，均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募集和供应。

上海的妇女也积极参加支援抗日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反日救国大同盟”，积极领导支援前线的工作，广泛进行抗日宣传。闸北分盟的妇女和丝厂女工，勇敢地在枪林弹雨中，爬到前线，抬回受伤的士兵。女青年会和女工夜校的妇女们，不顾疲劳，日夜为前线部队赶制军服，有的 3 昼夜不曾睡眠。

遭受战祸的难民们，更是积极支援抗战。青壮年纷纷参加义勇军，或到

前线参加作战，或在后方参加战勤工作，其他难民也踊跃为部队送水送饭。市郊农民都积极行动起来，帮助第十九路军挖战壕、筑工事、侦察敌情，有的加入义勇军到前线参加作战。吴淞、真如等地的农民，筹集大批米面、蔬菜、鸡蛋等，慰劳前线部队。前线战士每天两顿伙食，也都由郊区人民分区炊制和运送。

与此同时，上海人民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罢工、罢市的反日斗争和宣传抗日救亡的运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上海总工会下令总罢工，除水电、交通工人外，其他工人都参加了总罢工。在小沙渡、杨树浦等工人集中的地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上海 54 家日本工厂的六七万中国工人在举行罢工后，全体自动退出工厂。沪西区的十几家日本工厂的中国工人，成立了沪西反日罢工委员会，组织武装纠察队，封锁日厂，检查日货，监视奸商，禁止把粮食等物资卖给日商和日本侵略军。沪东码头工人拒绝为日军卸运军火，驳船工人拒绝为日军运送军需，电讯和铁路工人破坏日军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耶松、瑞镕船厂工人坚决不修理日船，在日本商店、机关作事的中国店员、佣人，也纷纷告退。上海的商人积极进行罢市和募捐，要求国民党政府派兵增援第十九路军作战。

上海市广大人民在一个多月的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积极支援抗战，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对敌斗争，在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各界同胞也积极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全国各地除积极声援外，爱国群众还组织义勇军，赶赴上海参战。各地运送大批物资到上海，支援抗战。广大群众写信、发电报、寄钱和衣物、食品等慰劳第十九路军。

淞沪抗战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领袖和上层爱国人士的热情支持。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军民捷报频传，冯玉祥称赞第十九路军的将士们是抗日的先锋队，他大声疾呼：“政府应当尽量接济，并赶快派遣军队前往应战，以增强我方之战斗力。”

他极力向各方呼吁，希望在军事、财力及道义上予以大力支援，以保证淞沪抗战能坚持下去，由此而打开中国抗战的新局面。

宋庆龄、何香凝深为第十九路军捍土卫国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在战火纷飞中，亲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l 月 30 日上午，她们同赴真如第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慰问。宋庆龄在炮声隆隆的阵地上对抗日健儿发表讲话：“你们抗战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她在与蔡廷锴亲切交谈时，一再勉励第十九路军将士奋勇杀敌。2 月 12 日，宋庆龄赶到战斗甚为激烈的吴淞前线，向战士们致意。在前线巡视中，宋庆龄还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她与第十九路军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

淞沪抗战爆发后，何香凝在一次亲临前线慰问中，适逢大雪，看到广大官兵却只穿单、夹衣各一套，立即回沪发动捐制棉衣运动，5 天之内就赶制全新棉服 3 万多套，运往前线，供将士们御寒。

宋庆龄、何香凝亲临前线，目睹抗日部队缺医少药，伤员得不到护理的境况，创办了“国民伤兵医院”，“为救护治疗此次为中国苦战之伤兵，并予以精神上之安慰与鼓励。宋庆龄还罩着白色护士服，亲自为伤员服务。

宋庆龄、何香凝等以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斗争，为挽救民族危亡呕心沥血的实际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战斗勇气和胜利信心。

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外爱国华侨也积极行动起来，从各方面全力支持和援助第十九路军抗战。广大侨胞对第十九路军英勇抗战，莫不热血沸腾，备受鼓舞。越南华侨报《群报》用特大号标题《蔡廷锴大胜日军》发出号外，并在报社门前燃放鞭炮，以示庆贺。侨胞们闻信，奔走相告，一时群情振奋。美洲华侨为表彰第十九路军，特赠送蔡廷锴一块金匾，上面题刻“ 精神救国 ”四个大字。

海外侨胞不但在精神上鼓励第十九路军，而且从资金和物力上支援淞沪抗战。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外侨胞立即采取各种形式，积极进行募捐，支援祖国抗日。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 4 天（2 月 2 日），第十九路军便收到了第一笔华侨捐款，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组织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委员会，设立宣传股、演讲队、劝募队等，积极筹募，不及两月，募集款项即达 100 万元。在美国芝加哥，著名艺术舞蹈明星刘科伦女士在抗日会义务表演，筹款数千元汇助第十九路军。旧金山等地华侨举行游艺募捐大会，男子每人捐助薪资一月。马尼提中学的华侨学生，节省零用，汇寄上海慰劳第十九路军。国民党元老黄兴之女黄澄华，出售自己的首饰，所得之资，全部捐献给祖国抗日之用。华侨捐款不仅速度快，而且数额巨大。美国旧金山华商周崧及其中兴公司职工共捐 12 万元。2 月 16 日，旧金山华侨开展援助第十九路军大募捐，当天就筹得美金 25 万元。到 20 日，据旧金山广东银行经理公布，该地华侨已电汇美金 100 万元捐助第十九路军。以李清泉为主席的菲律宾华侨国难后援会，在 2 月份先后两批汇回华侨捐款 10 万元和 15 万元。支援祖国抗日。据统计，菲律宾华侨在淞沪抗战期间共捐款 250 万元。

爱国侨领和知名人士不仅捐献巨款，而且还利用其地位和影响，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侨胞开展抗日捐献活动。陈嘉庚向华侨筹募巨款汇往上海，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新加坡的另一位巨商林义顺，“ 一 · 二八 ”战事发生时，适在上海养病，第二天他一连向新加坡发出 10 份电报，呼吁华侨奋起救国。胡文虎不待救援会成立，就电汇 1 万元交上海申报馆转交第十九军，作为救护伤员之用。2 月下旬又汇去 1 万元。时值何香凝正在上海组织救护队，因经费困难，特致函胡文虎请求援助，他又汇去 1 万元与大量药品。

据第十九路军司令部统计，仅捐款一项，在该军总收捐款 1068 万元中，即有 3/4 为华侨捐款。

同时，侨胞还捐献大量军用物资，运往上海。旧金山女侨胞组织针织团体赶织绒衣，寄赠第十九路军将士。美国、加拿大等国侨胞，购买了大量钢盔，运回国内赠送第十九路军。第十九路军缺乏飞机和汽车，菲律宾华侨就捐购了 15 架飞机，马尼拉粤侨出入口帮工界联合会和马尼拉粤侨工商联合会捐赠了两辆载重汽车。

华侨积极支援淞沪抗战，还表现在踊跃归国参战。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纷纷汇集至中国驻日公使馆，要求回国，公使馆办公到深夜，极为忙碌。仅 2 月 7 日，就有约 200 名留学生搭乘轮船回国参战。

一 · 二八事变前夕，上海战云密布，蒋介石即阴谋调离抗日情绪高涨的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出上海，以求避免战争。接着蒋介石又指令何应钦调派宪兵第六团一定在 28 日前赶至上海，接替十九路军七十八师闸北防地，不许贻误军机。27 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朱培德发来 3 次火急电报，内

称：“请你们一定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上海战端既起，南京政府惊慌出走，于 1 月 30 日迁都洛阳，但对上海抗战，却不予支援；不仅断绝十九路军的给养和军饷，同时还截留国内外同胞援助上海抗战的款项 700 余万元。同时，下令各部队不准支援上海抗战。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意旨，竟发电警告各部队：“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2 月中，日军不断增兵，十九路军孤军血战，极为艰难。经张治中亲向蒋介石求情，蒋介石始允何应钦下令组成第五军，于 2 月 16 日开赴前线，与十九路军并肩抗日。但是，南京政府对十九路军在战争中所消耗损失的武器弹药、医药器材，以至御寒棉衣，则一律不予补给。十九路军在第一线经常与日军短兵相接，急需大量手榴弹，军政部竟拒绝发给。为了解决此项急需，由上海总工会动员募集赶制几万只“土炸弹”送往前线使用。至于十九路军一再请领的平射炮、高射炮，军政部则始终拒发一炮一弹。

更有甚者，一·二八事变之初，南京政府海军当局竟与日本海军达成所谓“协议”，日本海军在下关开炮，中国舰队司令紧急命令各舰：日本海军炮击狮子山炮台及南京市，与我海军无涉。非日舰炮击我舰，不准还击。当十九路军与日军血战正酣，中国海军部次长李世甲竟然与日军司令官野村，同乘汽车参观中国阵地各处战壕，万目睽睽，毫无忌惮。

上海抗战发生后，南京政府一再宣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但是，实际上依然是抱不抵抗主义和依赖国联。南京政府一方面照会欧美各国，出面调停；一方面则向日本侵略者乞求和平。由于上海战争直接威胁到各帝国主义利益，因此，迫使他们采取比对待九·一八事变较为积极的态度。不仅在中日间奔走斡旋，并且以国联名义出面干预。

3 月初，由于日军偷袭浏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3 月 3 日，日军司令官根据其参谋总长的电示，发表停战声明。同日，国联决议中日双方下令停战。24 日，在英领署举行正式停战会议。

谈判中双方争论之点颇多，而在日军撤退时间、地点问题上尤为激烈。27 日，提出折衷方案五条。28 日至 30 日双方连续讨论无结果，会议陷于停顿。中国只好将上述问题提交国联特别委员会解决。30 日在国联大会上，修改的决议草案终于获得通过。此时蒋汪联合政府已于 4 月初成立，他们更加竭力破坏和出卖上海抗战。由此，中日停战协定得以在 5 月 5 日于上海签订。

淞沪停战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敌对行为。

第二条，中国军队，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的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可长期留驻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协定”把从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了日本及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共管。

上海抗战整整血战 33 天，中国军队仅以十九路军和新五军的兵力，抵抗众多的强敌，全体忠勇将士的浴血苦战，终使敌军三易主帅，死伤枕藉，士卒胆寒，朝野震惊，付出巨大的代价。然而，由于蒋介石、汪精卫顽固坚持不抵抗主义政策，终致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使中国人民又蒙受一个新的耻辱。而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却变本加厉地宣布了“ 攘外必先安内 ”为基本国策。

一·二八抗战中，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广大爱国官兵表现的高度爱国热情和抗日救国的英勇牺牲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上海的广大工人、学生和市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以及各种抗日爱国的群众组织的积极努力下，给予十九路军抗日的支援，也是极其巨大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一·二八抗战中取得的伟大胜利，表明了为民族生存而战的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装备远不如敌军，但抗日卫国的正义性质，和广大人民的支援，使中国军队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